

核心與邊緣

——馬來西亞沙巴原民性的形塑

吳佳翰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提要

本文從前殖民、殖民時期和國族國家時期探討馬來西亞沙巴州原民性的形塑。其原民性雖源自殖民知識，但基於前殖民時期的非類屬性文化認同。此認同強調後天環境和行為的影響。英殖民者把強調先天的祖籍及血統的類屬性文化認同帶入，形成類屬性和非類屬性的混雜認同。卡達山民族主義的興起也把沙巴原民性推向類屬性文化認同。沙巴當地人(Native)的概念在二戰前傾向於國籍，不包括砂拉越當地人和西馬馬來人，使沙巴的原民性有別於砂拉越和西馬。馬來西亞成立後，沙巴原民性面對馬來化和伊斯蘭化兩種面向的影響，進而發展出地方主義和多元主義。近年來，沙巴漢(Sabahan)的地方認同高漲，使得當地原民性不被強調。地方主義者因回應核心的權威而弱化原民性。縱觀歷史，核心與邊緣是形塑沙巴原民性的主軸。

關鍵詞：非類屬性、地方主義、多元主義、伊斯蘭化、馬來化

吳佳翰，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電子郵件：bernard.ng.jia.han@gmail.com。

一、前言：多層邊緣性形塑下的沙巴原民性

本文處理馬來西亞沙巴州複雜且多重的原民性(indigeneity/indigenouness)如何因多層「核心與邊緣」的關係而相互交錯。隨着原住民概念的國際化，原民性成為人類學的探討方向。原民性可以被簡單指涉為「和原住民相關的特性」。原民性廣義上可被定義為少數群體和在地性(locality)的直接關聯。^①在國際脈絡下，原住民的意義也被擴張成為非人道、不平等和受排擠的對待，可以向國際社會或國族國家要求更多道德主張的人群。Merlan 認為：

雖然存在強烈歷史和情緒內涵，原民性的意義並非基於某種「純粹在那裡」(simply there)的存在，也並非基於我們客觀且確定的「原住民」稱呼。好比其他很多的社會範疇，原民性是隨機、互動和歷史的產物。作為一個類別和一組制度，原民性也不能被充份理解為基於當地人與其他人之間的對立關係。^②

原民性的建構雖然具有特定的社會脈絡和歷史條件，但在一些社會卻是脫離原本「部落」的脈絡而重新建構的。原民性出現在各個脈絡的社會文化意義須被重新思考。^③每一個政體都有相對不同的原民性，擁有各自「隨機、互動和歷史」的發展脈絡，大致可分成「前殖民」、「殖民」和「國族國家」的歷史層面（沙巴近代史參見附表1和附圖1）。

在馬來西亞，擁有原民性的最廣義群體為土著(Bumiputera^④)，惟此概念不存在於《馬來西亞聯邦憲法》。根據《1963年馬來西亞協定》，東馬地區的沙巴和砂拉越在原住民事務上擁有自主權。因此，馬來西亞的原民性可被理解成三個獨立的系統：（西馬的）馬來人(Malay)、沙巴當地人^⑤(Sabah Native)和砂拉越當地人(Sarawak Native)。三者各有定義，享有憲法第153條^⑥所賦

① Francesca Merlan, "Indigeneity: Global and Local," *Current Anthropology* 50: 3 (2009): 304.

② Francesca Merlan, "Indigeneity: Global and Local," 319.

③ 徐國明，〈弱勢族裔的協商困境——從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來談「原住民性」與「文學性」的辯證〉，《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2期（2011年4月），頁214-215。

④ 源自梵文，即「大地之子」。「土著」在馬來西亞無貶義。

⑤ 筆者所譯。

⑥ 憲法第153條內容說明，授予馬來西亞最高元首為馬來人和其他土著民族保障馬來西亞公民權利和特別地位。這些群體透過配額，進入公務員體系，獲得獎學金和教育機會。它往往被論述為馬來西亞的「社會契約」，被引申成「馬來主權」(Malay Supremacy)。

予的、其他民族(main ethnic)無法在政治和經濟上享有的「特殊地位」(special position)。另外，三者各自無法獲取在自己領域以外的馬來保留地(Malay reserve land)或習俗地(Native land)。舉例來說，手持西馬護照的馬來人無法獲取沙巴或砂拉越的習俗地。

其中，「馬來人」的憲法定義和血統無關，須符合三個條件：母語為馬來語、宗教為伊斯蘭教和日常實踐為馬來人習俗。只要符合以上定義的馬來西亞人，不管是華人、印度人、卡達山人或是剛取得馬來西亞公民權的印尼或菲律賓原住民，都可以被聯邦政府歸為馬來人。^⑦ 如此寬鬆的定義，被視為是為了擴大馬來人的人口庫而設。^⑧ 因此，國家積極同化沙巴當地人、砂拉越當地人以及西馬原住民(aboriginal people)^⑨ 為馬來人。(馬來西亞常見的人群分類範疇與解釋見附表2)

擴大馬來人口庫是馬來西亞國族主義的主要議程，亦可稱為「土著主義」(Bumiputeralism)，旨在建立一個以馬來人文化及伊斯蘭教為核心價值的國族國家。但是，土著主義在沙巴和砂拉越受到阻礙，兩地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皆形成地方主義(Localism)。地方主義一般指重視地方的政治哲學光譜，常見於國家和地方關係的處理，傾向於保護地方的政治、文化、經濟等面向。

Barlocco 提出，沙巴主要當地人(卡達山人)在日常生活層面論述和實踐地方主義，抵抗伊斯蘭化(Islamisation)和馬來化(Malaynisation)。^⑩ 所謂伊斯蘭化，是讓國民改信伊斯蘭教；而馬來化則是讓穆斯林當地人認為自己是「馬來人」。Keller 則進一步提出，對抗馬來性(Malayness)的地方主義者還包括創造「沙巴漢」(Sabahan)的地方認同。^⑪ 為了回應土著主義，東馬地區推崇非馬來和非伊斯蘭為主的多元主義(Pluralism)。這兩股力量博弈多年，一直形塑着東馬的原民性。因此，邊緣理論(marginality)成為理解沙巴原民性的主要工具。

⑦ Lim Kit Siang, "It is easy to become a Malay," 11st June, 2007, <http://blog.limkitsiang.com/2007/06/11/it-is-easy-to-become-a-malay/>.

⑧ Rie Nakamura, "Race or Ethnic Group? Politics of Race in Malaysia,"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 (2015): 394-395.

⑨ 馬來文為 *Orang Asli*，直譯為「原始人」，主要分成三大組別 Negrito、Senoi 和 Proto-Malay。西馬原住民不符合憲法上馬來人的定義，只有少數的特殊權利。

⑩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28.

⑪ Ryan Keller, *Identity Formation in Sabah, Malaysia: Resistance and Negotiation of the Dominant State Narrative* (Master thesi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13), 64.

邊緣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所提出的邊陲(peripheral)相關，對應着核心(core)的概念。Andre Gunder Frank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提出的世界體系多集中在經濟的面向，即核心地區所生產的「高工資、高利潤和高資本密集」貨物，交換在邊緣地區的「低工資、低利潤和低密集資本」貨物。^⑫就政治和經濟面向，殖民力量和國族國家所建構的核心與邊緣影響着當地人群原有的身份認同理論。

何為邊緣？只要被認定為邊緣，即承認與核心的權力階序關係。透過適應和遊歷核心的空間，被邊緣的人群頓時就能發覺他們不是體系中的核心。經歷過核心的邊緣人群總是意識到居住在核心的人能夠享有特權、機會和經歷；Roberts 提及「被邊緣者永遠能察覺到他們的位置是和核心相對的。……在核心那裡，他們是缺席、無聲或隱形的」。^⑬如同 hooks 所說的，「在邊緣中，即整體的一部份，但在主體之外」。^⑭

東南亞的族群也存在着核心與邊緣的階序關係。身份認同在互動和跨境脈絡中產生，如情境論提出者 Edmund Leach 在《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所揭示的高地克欽人(Kachin)和低地撣人(Shan)的關係。^⑮這樣的高地和低地認同差異也出現在印尼，在將人群形容得越是山區和越內陸(Pedalaman)時，連結着越是落後的意象。^⑯邊緣的人群發現他們只能透過發展自己的社會和政治身份認同，與核心進行有限的對話。他們被迫改信核心的宗教，在核心尋求政治庇護。^⑰

在南婆羅洲，Anna Tsing 也透過 Meratus 人的邊緣性，展示居於山區的非穆斯林和海岸穆斯林的族群階序，以及印尼婆羅洲和爪哇島的政治階

⑫ Eric R. Wolf 著，賈士蘅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34。

⑬ Judith E. B. Roberts, "Discipleship with the Marginalized at the Centr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103:2 (2014): 191-192.

⑭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ix.

⑮ Victor Turner King, "Identities in Borneo: Constru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Borneo Studies in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eds. V. T. King, Z. Ibrahim & N. H. Hassan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8.

⑯ Tania Murray Li, "Introduction," in *Transforming the Indonesia Uplands: Marginality, Power and Production*, ed. T. M. Li (London: Routledge, 1999), xvi-xvii.

⑰ John R. Bowen, "The Forms Culture Takes: A State-of-the-Field Essay on the Anthropology of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4 (1995): 1066.

序。¹⁸ Meratus 人不喜歡被統治者劃分成「某類」人群，他們宣稱自己所想像的人群差異是受到外來力量而引起的。他們傾向促進異質性和爭議，且對「共同體」的形成沒有共識，有的只是評論的雜音。¹⁹ 以上的現象和當代沙巴當地人的人群分類類似，他們否認過去殖民者或民族主義者所賦予的統稱，而且傾向於碎片化 (fragmentation)——不斷從過去單一的官方社會分類，分裂成多個民族。

沙巴當地人的族群階序來自前殖民所形成的經濟世界體系。島嶼東南亞在前殖民時期因依靠航海與世界經濟聯繫，以致越靠近海岸則越都市化。前殖民時期，沙巴長期受到汶萊王朝（西海岸）和蘇祿王朝（東海岸）的影響，早已捲入當時的世界體系。兩個王朝的核心分別是汶萊河 (Brunei river) 流域及霍洛島 (Jolo island)，沙巴當今的領土對汶萊和蘇祿蘇丹而言也是屬於支撐核心運作的邊緣之地。沙巴與外界的邊緣關係僅在殖民時期稍微緩和，尤其二戰前僅受公司形式的政權殖民，受英國間接殖民。馬來西亞成立後，沙巴在聯邦層次的政經地位又回到邊緣。²⁰

聯邦的土著主義之所以會在東馬面對抵抗，是因為聯邦政府常處於「西馬本位」(Malaya-centric)。其中人口比例和歷史因素是導致以上現象的主要原因。馬來西亞八成的人口居住在西馬，雖然西馬的面積僅佔馬來西亞四成。東馬的經濟、教育、衛生和基礎設施與西馬存在很大的落差，「許多西馬人 (West Malaysian) 對沙巴和砂拉越知之甚少 (an ocean of ignorance)」。²¹ 1957 年，馬來亞聯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獨立，由 11 州屬組成。許多西馬人僅把 1963 年成立的馬來西亞聯合邦當成「馬來亞聯合邦的擴大版」，²² 只是多了新加坡（1965 年退出）、沙巴和砂拉越的「加入」。

沙巴的原民性受到核心與邊緣相互作用的影響。其原民性的範疇變得複雜，有 KDMR 群、原住民 (Indigenous)、當地人 (Native)、卡達山 (Kadazan)、土著、泛土著 (Pribumi) 和叢群 (Rumpun)。這些概念是隨着時間發展的，前四

¹⁸ Robert Wessing, "Reviewed Work(s):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 *Asian Folklore Studies* 53:2 (1994): 377.

¹⁹ Anna Lowenhaupt Tsing,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6.

²⁰ 沙巴在建國初期的經濟地位並不差，1970 年的人均 GDP 全國 14 個州屬中排名第三，1980 年和 1990 年則排名第七，2000 年和之後則在末三名之間徘徊。

²¹ Lim Kit Siang, *The Cries of Sabah* (Petalang Jaya: Daun Merah Trading, 2008), 4.

²² 楊建成，《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西馬來西亞華巫政治關係之探討，1957-1978 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頁 21。

者是建國前的概念。Ueda 探討了「當地人」這個概念在殖民時期的演變，認為「『當地人』概念是個不斷修正的產物，並會根據時代需求額外增設的說辭」。²³

然而，沙巴當代的地方主義（見附圖2）已經脫離 Reid 所定義的脈絡。²⁴ 面對伊斯蘭化，非穆斯林當地人放棄過去脆弱的 Pagan²⁵ 身份，選擇改信基督宗教；沙巴的非穆斯林當地人同時選擇碎片化，不斷分裂成更多民族。面對馬來化，穆斯林當地人拒絕統一成聯邦政府定義下的「馬來人」，他們選擇碎片化，自立文化協會和進行一系列的文化再造運動。文化再造運動也出現於非穆斯林當地人，此現象可透過「叢群」這一概念加以闡述。需留意的是，沙巴和砂拉越當代的地方主義存有差別，有別於碎片化，砂拉越非穆斯林當地人選擇統一成「達雅」(Dayak) 這一民族。²⁶

二、前殖民與殖民時期（15世紀至1963年）

（一）非類屬性文化認同

本文首次點出沙巴原住民所具有的非類屬性文化認同（“unkinded” cultural identity），並透過以下方式論證。此認同理論的發展建立在族群認同理論（Theory of Ethnicity）和文化認同理論（Theory of Cultural Identity）上。這主要源自西方通用的集體認同理論和西方社會科學家所建構的理論。²⁷ 經過多年的磨合，目前族群認同研究採取根基論（primordialism）和建構論（constructivism）兩大途徑。根基論常見於官方的族群分類，把地域、親屬、語言、宗教、習俗、血緣或祖源等作為認同的基礎。這些基礎被根基論者視為「自然」的連帶，族群被定義成享有共同起源，宣稱有共同和特殊歷史與命

²³ Toru Ueda,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Native Concept in North Borneo during Colonial Period,” *Akademika* 68 (2006): 65-66.

²⁴ Anthony Reid, “Endangered Identity: Kadazan or Dusun in Sabah (East Malay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8: 1 (1997): 120-136.

²⁵ 源自於拉丁語鄉下之意，是早期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對鄉下實踐多神信仰的人群稱呼，而殖民者把這套帶有自我優越感的貶稱帶入馬來西亞。

²⁶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62.

²⁷ Jocelyn Linnekin, Lin Poy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2.

運，擁有一個或多個特徵，以及感覺集體特殊與團結感的社會群組。^{②⑧} 認同研究隨後轉向建構論，試圖拆解根基論中原生、本質的連帶。^{②⑨} 建構論者認為族群源自社會概念的建構，並非與生俱來或真實的，而是着重於政治發展和權力關係。

Linnekin 和 Poyer 指出族群認同理論仍把族群視為相互排斥 (mutually exclusive) 或無法重疊的群組。簡言之，雖然我者可以流動成他者，反之亦然，但是不存在「我者認為自己同時是他者」的多重認同。認同的多重性和轉換認同的自願性，可透過太平洋民族誌展現。^{③①} Linnekin 和 Poyer 提出西方的族群認同理論和太平洋的文化認同理論有着根本上的差異。^{③②} 他們提出文化認同來取代族群認同，並把文化認同意義為強調居住環境、行為和情境彈性的模式。

同時，James Watson 借用遺傳學的概念，把以上西方的族群理論稱為「孟德爾型」(Mendelian model)，同時提出嶄新的「拉馬克型」(Lamarckian model) 文化認同。^{③③} 「孟德爾型」把先天和後天對認同的影響清楚劃分為兩套質性因素，但「拉馬克型」則把先天和後天的因素連接起來。Micheal Lieber 則提出「社會性人觀」(consocial personhood) 的概念，認為人的社會位置和在 interpersonal 網絡中的位置可以形塑個體的身份與認同。簡單來說，「拉馬克型」文化認同強調「你做了什麼決定了你是誰，而不是你是誰決定你能做什麼」。^{③④}

Astuti 在馬達加斯加斐索人 (Vezo) 的研究中，提出「非類屬性」認同模式；強調當下（而非過去）和踐行 (performative) 的認同模式。^{③⑤} 透過游泳、吃魚的方式、暈船、捕魚技巧、收魚線的痕跡、面對海難的冷靜、造船、賣魚的策略等都能讓一個人成為「依海之人」斐索人。斐索人的文化認同對應的是依山、農耕為主的瑪希孔羅人 (Masikoro)。斐索社會同時存在兩種認同模式，人死後因無法行動且成為過去，最終必然依據墓穴的選擇而被歸類，

②⑧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Revival*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6.

②⑨ 郭佩宜，〈導讀：當下南島，未來非洲〉，Rita Astuti 著，郭佩宜譯，《依海之人：馬達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橫跨南島與非洲的民族誌》（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17），頁23。

③① 太平洋：筆者不選用大洋洲，因為所指涉的對象不包括澳大利亞。Jocelyn Linnekin, Lin Poy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2, 9.

③② Jocelyn Linnekin, Lin Poy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6.

③③ Jocelyn Linnekin, Lin Poy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8.

③④ Jocelyn Linnekin, Lin Poy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7, 13.

③⑤ Rita Astuti 著，郭佩宜譯，《依海之人：馬達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橫跨南島與非洲的民族誌》，頁279。

接受承認繼嗣、血統而個體化的「類屬性」認同模式。簡單而言，類屬性模式強調存有(being)的狀態，非類屬性模式強調實作(doing)的方式。^{③⑤}

郭佩宜指出，非類屬性模式跨越太平洋，適用於美拉尼西亞的郎加郎加人(Langalanga)和凱南圖人(Kainantu)等南島社會。^{③⑥} 郎加郎加人認為「讓土地與人無法分割的連結是社會的核心」；凱南圖人認為「在一個地方居住，會吸收、浸潤環境與地景」。^{③⑦} 然而，強調當下的行為與表現並非忽視歷史因素，歷史的影響能夠改變人群原初的非類屬性模式。文化認同的演變需從兩個觀點切入：文化群體理解社會世界和整理自身經驗的方式；社會事實與行動所發生的歷史脈絡。^{③⑧} 因此，「當下的文化認同是當地理論和歷史過程互動的結果，每一個民族誌案例都是獨特的」。^{③⑨} 在現實世界裡，人群的劃分很難呈現「類屬性／非類屬」這般截然二分的模式。因此，筆者選擇使用「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一詞，而不是常用的「族群認同」(ethnicity)來指涉本文的認同模式。

沙巴當地人可據祖先移居的時間點分成：自認世代久居和16世紀前後移居。^{④⑩} 前者可用當今最政治正確的名稱「KDMR 群」^{④⑪} 來指稱；後者沒有統稱，為了對應 KDMR 群，本文稱他們為「非 KDMR 群」，幾乎全是穆斯林。這兩群南島語族底下的族名更是繁雜，有的是自稱、互稱，或是重新賦予新意的舊稱。^{④⑫} 他們早期的人群劃分和命名方式，實屬非類屬性文化認同模式。

③⑤ Rita Astuti 著，郭佩宜譯，《依海之人：馬達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橫跨南島與非洲的民族誌》頁52、276。

③⑥ 郭佩宜，〈導讀：當下南島，未來非洲〉，Rita Astuti 著，郭佩宜譯，《依海之人：馬達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橫跨南島與非洲的民族誌》，頁28。

③⑦ 郭佩宜，〈導讀：當下南島，未來非洲〉，Rita Astuti 著，郭佩宜譯，《依海之人：馬達加斯加的斐索人，一本橫跨南島與非洲的民族誌》，頁28-29。

③⑧ Jocelyn Linnekin, Lin Poy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260.

③⑨ Jocelyn Linnekin, Lin Poy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7.

④⑩ Ranjit Singh Darshan Singh, *The Making of Sabah 1865-1941: The Dynamics of Indigenous Society* (Kota Kinabalu: Sabah Chief Minister Office, 2000), 5.

④⑪ Kadazan Dusun Murut 和 Rungus 族的合稱。他們早期信奉祖靈信仰，相信宇宙擁有一個非全知全能的創造神(Kinoingan/Kinorohingan)，創造神底下的萬物卻有各種各樣的靈魂與祖魂，即是一神論(monotheism)，也是泛靈論(animism)。自英殖民時期，大部份改信天主教，部份改信伊斯蘭教，但他們私下卻實踐部份祖靈信仰。

④⑫ Ranjit Singh Darshan Singh, *The Making of Sabah 1865-1941: The Dynamics of Indigenous Society*, 7-8; Benedict Topin, *Kadazandusun: Our Sacred Identity* (Penampang: Koisaan Publications, 2017), 12.

KDMR 群的口述歷史和神話中沒有移居沙巴的典故。^{④③} 2010年後，他們分為四大群體：卡達山、杜順(Dusun)、姆律(Murut)和龍骨斯(Rungus)，因此簡稱 KDMR。^{④④} 若照語言學分類，KDMR 群皆屬馬來—玻里尼西亞(Malayo-Polynesian)分支下的北婆羅語群(North Bornean Languages)。^{④⑤} KDMR 群原本居住在海岸或山區，依循着習慣法高度自治。16世紀起，非 KDMR 群遷移至海岸，迫使原本的 KDMR 群往內陸移居(見附圖3)。19世紀，歐洲殖民者根據居住地點把這兩群人分為「海岸／內陸居民」，或根據宗教信仰分為「穆斯林／Pagan^{④⑥}」。

如今，隨着人群的移動和伊斯蘭教的傳播，以上的分類已經無法清楚地劃分這兩群人。如何統稱這群自認世代久居的當地人？這在沙巴是個仍未解決，或是不太可能解決的問題。這個統稱從殖民時期的 Dusun、Kadazan，或建國後的 Kadazandusun (KD)、Kadazandusun-Murut (KDM) 和 Kadazandusun-Murut-Rungus (KDMR)，都是隨着社會脈絡而改變。筆者認為，與其找出最合適的統稱，不如承認 KDMR 群擁有不願意被命名和定型的傾向。這和 Meratus Dayak 一樣，大部份 KDMR 群拒絕外來人所給予的統稱。^{④⑦}

KDMR 群在殖民前傾向於用生活方式命名群體。人們過去的行動範圍有限，加上隨意闖入其他方言群的人隨時會被獵頭，因此生活方式和居住環境有着密切的關係。在 KDMR 群的自我分類裡，不同地區的自我命名方式和地理位置、地方名、樹名、山名、河名等有關。最常見的類型有指涉「山區之人」、「近岸或平原之人」以及「河流之人」的方言，這些方言群所指涉的對象隨着彼此相對的居住地而變化。山區之人的稱謂有：

④③ 但是都有大洪水的傳說，或是人群在 Nunuk Ragang (卡達山杜順語，意為紅色的大榕樹) 下聚集，形成文化後再度移居到其他地方。參見 Raymond Majumah, *Rungus: Peribumi Momogun Sabah (Rungus: Momogun Native of Sabah)*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5), 15。

④④ Raymond Majumah, *Rungus: Peribumi Momogun Sabah (Rungus: Momogun Native of Sabah)*, 32.

④⑤ 除了卡達央人(Kadayan)的身份比較曖昧，不屬於北婆羅洲語群，卻被卡達山社群納入 KDMR 群。Alexander D. Smith, *The Languages of Borneo: A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2017), 440-441.

④⑥ 需注意的是，部份 KDMR 群長時間和穆斯林互動，在殖民者抵達之時，部份方言群已經改信伊斯蘭教，如比薩雅人(Bisaya)、卡達央人等。

④⑦ Anna Lowenhaupt Tsing,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 52-53.

Tagahas、*Tuhun Tidong*、*Tuhun Sokid* 和 *Tulun Tindal*。^{④⑧} 近岸或平原之人的稱謂有：*Tangara*、*Tangaa*、*Katangaan*^{④⑨}、*Kadazan*（卡達山）和 *Tuhun Sondot*。^{⑤⑩}

其中，*Tulun Tindal* 和 *Tuhun Sondot* 的自稱敘述了他們的遷移史，因為 *Tindal* 也有「從水到乾地」、「從低處到高處」的意思。^{⑤⑪} 如此的人群劃分和繼嗣或與血統無關，它反而和環境及其變遷有關。早期 *Tindal* 居住在西海岸北側，後來巴瑤人(*Bajau*)^{⑤⑫} 移居海岸，把他們生活空間遷入內陸；伊拉農人(*Iranun*)^{⑤⑬} 之後再遷至海岸，把巴瑤人和 *Tulun Tindal* 的生活空間壓縮至更內陸和高地。以此類推，*sondot* 的意思包含從高地抵達低地的意思，^{⑤⑭} 極可能暗示了人群的遷移路徑。如今被歸類為姆律人的人群裡，有至少七個自稱^{⑤⑮}「河流之人」。KDMR 群的居住地，依然是自稱的主要依據，也是非類屬性的重要特徵。

非 KDMR 群和 KDMR 群有着幾乎一樣的文化認同模式。來自南中國海和蘇祿海(*Sulu Sea*)的他們，隨着汶萊王朝和蘇祿王朝的勢力移居至沙巴的西海岸和東海岸。這群穆斯林主要分為汶萊人(*Brunai*)、巴瑤人、伊拉農人和蘇祿人(*Suluk*)。^{⑤⑯} 前者來自汶萊灣，後三者來自蘇祿海區域。汶萊人的觀點可進一步論述非類屬性文化認同。汶萊人稱居住在平地或河谷、從事農耕的人群為「杜順人」(*Dusun*)。*Dusun* 在馬來語為「果園或莊園」或「鄉下」。

④⑧ *Tuhun* 或 *Tulun* 都是「人」的意思。Dayu Sansalu, *Warisan Sejarah Kadazandusun (Heritage of Kadazandusun History)* (Kota Kinabalu: Kadazan Dusun Cultural Association, 2017), 54.

④⑨ 以上三個自稱為「中間」的意思，對山區的人來說，他們居住在海岸和山區之間的平原或河谷。

⑤⑩ Dayu Sansalu, *Warisan Sejarah Kadazandusun (Heritage of Kadazandusun History)*, 52.

⑤⑪ 訪談筆記：Paul Porodong（沙巴人類學家），2018年11月13日，亞庇。

⑤⑫ 他們所說的 Sama-Bajaw 語，屬於泛巴利多(Greater Barito linkage)語群分支。

⑤⑬ 他們所說的 Maranao Iranun 語，屬於泛中菲律賓(Greater Central Philippine Languages)分支，比 North Bornean Languages 更接近塔加洛語(Tagalog)。

⑤⑭ KDCA ed., *Kadazan-Dusun-Malay-English Dictionary* (Penampang: Kadazan Dusun Cultural Association, 2015), 634.

⑤⑮ 根地咬的 *Nabai*、丹南的 *Timogun*、Sook 河上游的 *Boakan*、Dalit 河的 *Tagal*、Bole 和 Meligan 河附近的 *Kolor*。參照 Ranjit Singh Darshan Singh, *The Making of Sabah 1865-1941: The Dynamics of Indigenous Society*, 11。

⑤⑯ 他們所說的 Tausug 或蘇祿語，屬於泛中菲律賓語群。

「杜順人」是「莊園之人」或「鄉區之人」的意思。⁵⁷ 他們稱居住在內陸山區的人群為「姆律人」(Murut)。⁵⁸ 英殖民者抵達沙巴時，接觸了會說通用語馬來語的汶萊人，採用汶萊人的人群命名方式，影響至今。

跳脫汶萊人的視角，沙巴第二大民族巴瑤人的稱呼方式也非常類似。來自菲律賓南部的巴瑤人稱 KDMR 為 *Ida'an*，意指居住在海岸、沒有信仰或自然信仰的人。⁵⁹ 杜順人同樣稱巴瑤人為 *Sama*，意指信奉伊斯蘭教的海洋游牧族群。⁶⁰ 這群近代住在船上的游牧人群自稱 *Sama Dilaut*⁶¹ 或 *Sama Mandelaut*，即「海洋巴瑤人」的意思。他們也自稱 *a'a dilaut* (海上之人)，並稱定居在陸上或岸邊的人為 *a'a déa* (陸上之人)。⁶² 和 KDMR 群類似，巴瑤人和汶萊人一樣，多以居住的地理環境稱呼對方為「果園／山上／海岸／海上／陸上」等的人。

在面對相同族群時，當地人傾向於在自稱或族語「人」之後加上修飾的地方名詞。巴瑤人彼此自我介紹時，會在自稱 *Sama* 之後加上他居住的島嶼或是海岸名稱。⁶³ 居住在內陸的姆律人則會在 *Ulun* (人) 之後加上附近河流的名字。⁶⁴ (KDMR 群、巴瑤人和汶萊人之間的自稱和互稱見附表3)

居住地和生活方式是劃分人群的標準，也是族名的由來。沙巴大學民族學 Pugh-Kitingan 教授提出，沙巴當地人自古以居住地區作為自我辨認的基

⁵⁷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Meaning of Dusun, Malay wording reference centre," 2018, http://prpmv1.dbp.gov.my/Search.aspx?k=dusun&fbclid=IwAR2M1kTtvosh5das-OHEZEJZZROxZc7_sVEehtfOTwa3BBvXan3v6cZRcex8; Dayu Sansalu, *Warisan Sejarah Kadazandusun (Heritage of Kadazandusun History)*, 48.

⁵⁸ 關於 Murut 或是 Rungus 名稱的來源，目前還沒有統一的說辭。Owen Rutter 說 Murut 來自於巴瑤語的「山」(*Belud*)，進而把 Murut 形容成「山區之人」。然而，不管從發音上，或是從巴瑤人與姆律人地理上接觸較少上考慮，這種說法都缺乏說服力。Owen Rutter, *British North Borneo: An Account of its History, Resources, and Native Tribes*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Limited, 1922), 65.

⁵⁹ Ranjit Singh Darshan Singh, *The Making of Sabah 1865-1941: The Dynamics of Indigenous Society*, 14.

⁶⁰ Owen Rutter, *The Pagans of North Borneo*, 30.

⁶¹ 馬來語 *di* 是方位詞「在」，*Laut* 是「海」。*Laut* 源自古馬來亞玻里尼西亞語(Proto Malayo-Polynesian)的 *laHut*，意思是「向海」。

⁶² Clifford Sather, *The Bajau Laut: Adaptation, History, and Fate in a Maritime Fishing Society of South-Eastern Sabah*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6.

⁶³ Clifford Sather, *The Bajau Laut: Adaptation, History, and Fate in a Maritime Fishing Society of South-Eastern Sabah*, 5.

⁶⁴ Owen Rutter, *The Pagans of North Borneo*, 31.

礎，同時他們也清楚彼此的方言、習俗和其他文化實踐之差異，並透過族名來區分。^{⑥5} 殖民前的人群流動性不高，而他所居住的地點通常也決定生活方式。在採集四周的天然資源外，居住在山區的人以輪耕維生；居住在近岸平原的人以水稻維生；居住在岸邊的以貿易和漁業維生；海上游牧的以貿易、漁業、販賣奴隸和劫持商船維生。^{⑥6} 這些劃分和 Astuti 所描述的非類屬性文化認同極為相似，與其說是人群的「類別」，不如說是人群的「狀態」，惟這些狀態在過去因人群移動低而較為穩定。

前殖民時期的互稱彼此存在着政經面向的邊緣性。汶萊人多是汶萊王朝的貴族或商人的後裔，自認比 KDMR 群優越。汶萊人的稱呼存在着貶義，「杜順」有着「鄉下、無信仰者和原始」之意；「姆律」則更加「落後」，是被隔絕的「低文明人」。^{⑥7} 在19世紀中葉前，處在下游的 KDMR 群是非 KDMR 群和內陸 KDMR 群的中間商。因此，下游的 KDMR 群因為經濟能力而自覺比內陸 KDMR 群優越。自認在政治經濟比「他族」更優越的劃分，是定義「我族」的方式。掌握政治和經濟優勢的群體，可以透過邊緣他族，進而自我核心化。

前殖民的 KDMR 群和非 KDMR 群的人群劃分方式呈現高度的非類屬性文化認同：一種根據生活方式和居住地而定義彼此的模式。上游的 KDMR 群、下游的 KDMR 群、非 KDMR 群等彼此之間根據核心與邊緣的關係，建構我群和他群的稱呼。這些群體並沒有根據抵達沙巴的早晚來定義誰更具有原民性。沙巴原民性的生成和英國殖民者有關。

（二）原民性的生成：原住民(Indigenous)和當地人(Native)

人口普查、地圖和博物館這三個制度是殖民政府的治理手段，「深刻地形塑了殖民政府想像其領地的方式」。殖民者對自身的分類邏輯其實也感到困惑，但這些認同卻透過行政的穿透力，促成這些認同的實體化。^{⑥8} 殖民前

^{⑥5} Jacqueline Pugh-Kitingan, "Review of *Identity and the State in Malaysia*," *Borneo Research Bulletin* 46 (2014): 389.

^{⑥6} Ranjit Singh Darshan Singh, *The Making of Sabah 1865-1941: The Dynamics of Indigenous Society*, 15.

^{⑥7} Anthony Reid, "Endangered Identity: Kadazan or Dusun in Sabah (East Malaysia)," 121-122.

^{⑥8}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232、234。

的沙巴各族並沒有原民性的概念。透過人口普查制度以及政策的施行，殖民者把原民性的概念帶給各族。這原民性可分成原住民和當地人兩大類。相較於不同歷史脈絡的西馬和砂拉越，沙巴的原民性獨立於前兩者，當地人的定義比較接近國籍(nationality)。

殖民者英屬北婆羅洲特許公司（以下簡稱特許公司）對沙巴（時稱北婆羅洲）進行了五次人口統計（1891、1901、1911、1921、1931）。^{⑥9} 這期間的人口劃分是以國籍為主，直到戰後英國直接殖民的1951年和1960年普查才改由具有生物性的「種族」(race)為主。此改變是因為「統計員無法分辨國籍和種族」。如此的做法比馬來聯邦^{⑦0} 遲了50年。在砂拉越，首次的人口普查（1947年）則直接採用「種族」的分類概念。^{⑦1} 簡言之，殖民者對沙巴「種族」的想像，遲至1951年才轉移至沙巴各族。

為了追求細緻度，筆者選擇透過1911年至1960年的普查資料（見附表4），進一步討論原住民(indigenous)和當地人(Native)的概念。特許公司把人群分成四大類別——歐洲人、原住民、中國人和其他國籍。^{⑦2} 換句話說，原住民的概念不包括歐洲人、中國人和其他非沙巴國籍的人群。殖民者同時讓大批中國人移入沙巴，從而改變人口結構，也讓原住民有了非原住民的參考群體。

以1931年的普查為標準，原住民包括杜順人、姆律人、巴瑤人、雙溪人^{⑦3}、汶萊人、卡達央人、比薩雅人、蘇祿人和蒂東人(Tidong)。^{⑦4} 這些人群是上一節所說的 KDMR 群和非 KDMR 群。需注意的是，沙巴原民性的概

⑥9 1941年因為二戰而沒有進行。

⑦0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96-1946)，由四個英國保護的馬來王朝組成的聯邦，分別是雪蘭莪、霹靂、彭亨和森美蘭。後來和另五個馬來王朝（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柔佛）、檳城和馬六甲共組「馬來亞聯合邦」（1948-1963）。

⑦1 Shyamala Nagaraj et., "Counting Ethnicity in Malaysia: The Complexity of Measuring Diversity," in *Social Statistic and Ethnic Diversity: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Classifications and Identity Politics*, ed. Patrick Simon, Victor Piché, Amélie A. Gagnon (New York: Springer Open, 2015), 150, 164.

⑦2 Lawrence Walter Jones, *North Borneo, Census of Population Taken on 10th August 1960, Additional tables* (Kuching: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24-25, 54, 100.

⑦3 *Orang Sungai*, 居住在沙巴東海岸的穆斯林，因受到蘇祿王朝的影響，在英殖民勢力抵達時，大部份已改信伊斯蘭教。*Sungai* 指河流；雙溪人指的是「河流之人」。

⑦4 Lawrence Walter Jones, *A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Held on 4th June, 1951* (Lond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lony of North Borneo, 1953), 43; Lawrence Walter Jones, *North Borneo, Census of Population Taken on 10th August 1960, Additional tables*, 29.

念自1911年開始即排除當時屬於不同政體的砂拉越當地人和馬來人，此概念影響至今。這源自人口普查的詮釋極為重要，因為沙巴之後沒有再進一步定義原住民的民族清單。

當地人概念的形塑則比較複雜。在《1952年當地人定義詮釋法》（以下簡稱《當地人詮釋法》）制定之前，當地人在各個法令呈現不同的定義。這些定義在最寬鬆的《1919年基督宗教結婚法令》包含中國人，而在最嚴謹的《1949年勞工法令》則只包括英屬婆羅洲地區的原住民。當地人的概念是殖民者為了控制被殖民者，為了滿足個別法令而定義的，是一種殖民知識（Colonial Knowledge），隨着需求而變化。^{⑦⑤}然而，當地人的概念非常接近國籍。在戰前的教育程度普查裡，人群又被分成「北婆羅洲的當地人」、「馬來群島^{⑦⑥}的其他當地人」、中國人和其他。^{⑦⑦}當地人的概念常和政體或區域連接使用，應是統稱這些地域的非移民。

殖民的力量同時影響當地人先前的認同模式，呈現類屬性和非類屬性的混雜模式。二戰後，直接殖民的英政府統一之前複雜多樣的當地人定義，推出《當地人詮釋法》。人群可透過出生（by birth）或法律及當地人法庭（by Virtue of Operation of Law）的途徑獲得當地人地位。^{⑦⑧}前者定義無爭議，其雙親（含習俗定義下的領養）必須是原住民，這無疑是強調天生祖籍的 being 模式。法律途徑的定義則強調個體的 being 和 doing。Being 指涉個體必須是馬來群島原住民的後代；doing 強調的是申請者必須原居在當地人酋長（Native chief）管轄下、當地人居多的社群。

但此定義還是引起人民的爭議，導致1958年英政府修案縮小當地人的定義。「不斷增加的移工可能宣稱自己符合此定義」，英政府稱此修案是「為了釐清他們的地位」。^{⑦⑨}透過法律途徑，1958年的版本更加強調 doing，及沙巴這個居住地的優先性。其他馬來群島原住民的後代需要更多的「北婆羅洲連結」（North Borneo link）才能成為當地人。這些連結是 doing，如推崇居住

⑦⑤ Toru Ueda,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Native Concept in North Borneo during Colonial Period," *Akademika* 68 (2006): 86.

⑦⑥ 今新馬汶印和菲南。

⑦⑦ Lawrence Walter Jones, *North Borneo, Census of Population Taken on 10th August 1960, Additional tables*, 28.

⑦⑧ Nazir Udai, *Explanation of Interpretation (Definition of Native) Ordinance (Sabah Cap. 64)* (Kota Kinabalu: Sabah State Government, 1995), 8.

⑦⑨ Great Britain, *Colony of North Borneo Annual Report, 1958*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9), 99.

時間的長度和良好品性的培養。《當地人詮釋法》的修訂和1953年成立的「卡達山協會」(Society of Kadazans)息息相關。它代表當地人受到殖民知識的影響，建立跨方言群的民族認同，也開始爭取自己的原民性權利。在進入卡達山的概念之前，殖民初期的當地人內部依然是非 KDMR 群為政經核心，KDMR 群為邊緣。同時，華人的經濟地位在殖民後期逐漸成熟，進一步讓 KDMR 群自覺處於社會的邊緣。

(三) 邊緣群體的翻轉：卡達山(Kadazan)

卡達山民族主義(Kadazan Nationalism)是沙巴首個具有民族意識的運動。^{⑧〇}它讓沙巴的 KDMR 群自我想像成「擁有共同祖源、共同(客體化的)文化、語言和傳統」的卡達山人。^{⑧一}卡達山民族主義成功讓 KDMR 群從邊緣地位翻轉成核心的一部份。推動民族主義的卡達山菁英(Kadazan intelligentsia)多是來自沙巴的兵南邦縣和吧巴縣^{⑧二}、擁有卡達山和華人血統^{⑧三}、接受西方教育的天主教徒。他們自認是 Sino-Kadazan(擁有華人和卡達山雙血統)，是屬於卡達山民族底下的方言群。此民族主義對沙巴的影響深遠，促成1963年馬來西亞的成立。^{⑧四}

在1950年代前的沙巴，「卡達山」這一自稱並不普遍，是兵南邦縣和吧巴縣(見附圖4)種植水稻維生的方言群。他們在1960年或之前，仍被英殖民者劃分為「杜順人」。居住位置和教會學校對這群卡達山菁英的崛起影響甚大。二戰間，殖民政府把首府從東海岸的山打根遷至西海岸的亞庇。因兵南邦縣非常接近亞庇，這群菁英經常與外界互動，在兵南邦縣的聖邁克爾學校(St. Michael's School)就學，在學校隔壁的教堂改信天主教，接受現代化洗

⑧〇 Margaret Roff, "The Rise and Demise of Kadaz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 2 (1969): 329.

⑧一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65, 76.

⑧二 因為吧巴縣的代表比例較少，本文追隨着大部份英文和馬來文文獻，只專注在兵南邦縣。

⑧三 文中沒有提到的有 Richard Yapp, Cyril Fong, Willam Chan, Frederick Tan, Fong Peng Loi, V. J. Lim, Lim Hong Ghee, Mansuet Yapp, Leopold Chuan, Francis Wong, Alex Ng, Cladius Yap, Amadius Leong, Aloysius Liew, Aning Lee, Clement Yapp 等。以上人物都是透過沙巴文獻館藏的舊報紙找到的，皆在卡達山協會擔任職位。除了田野調查，本文的歷史資料來源涵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的公共或大學圖書館和文獻館。

⑧四 Marcel Leiking, "Message from President of Kadazan Society Sabah" in *KSS Hontog Kaamatan 2017*, eds. Adrian Majawai, Blasius Binjua (Penampang: Kadazan Society Sabah, 2017), 9.

禮。源自倫敦的米爾山宣教機構(Mill Hill Missionaries)於1890年創辦該天主教學校，除了英語，教職人員也使用卡達山語授課、佈道，編製聖經，吸引卡達山方言群前來就讀。^⑤和政府學校畢業生不同，教會學校畢業生的英語能力強，更容易升學，進入政府機構工作。^⑥兵南邦縣卡達山方言群的特殊處境，讓他們比其他方言群更具優勢，更早發起民族主義運動。

卡達山協會是沙巴第一個當地人文化協會，其目標有三：第一，照顧卡達山人的文化語言，提升卡達山人的生活水平；第二，讓卡達山豐收節(*Kaamatan*^⑦)成為官方節日；第三，讓混血的 Sino-Kadazan 和當地人一樣享有擁有和繼承習俗地的權利。^⑧卡達山菁英透過卡達山協會、自創的報章和電臺把卡達山方言標準化和文字化。1960年，協會成功讓豐收節成為全沙巴的公共假期和節慶。卡達山菁英重新賦予「Kadazan」一詞「現代」的意義，取代具有貶義的「杜順」。^⑨杜順人是被汶萊人邊緣化的他稱，卡達山人其實是自我核心化的自稱。卡達山對他們來說就是「人」或「住在海邊的人」的意思。^⑩

「卡達山」取代「杜順」的倡議雖然成功，但仍遭受部份反對聲浪。來自斗亞蘭縣、蘭腦縣、擔布南縣和根地咬縣（見附圖4）的方言群已經內化了杜順這名稱，以致卡達山協會無法在這些郊區設立支會。^⑪他們聲稱卡達山一詞也是來自外來的馬來語「*kedai*」（商店），而 *kedaian*^⑫ 是「住在商店住屋的」，*kadazan* 只是海岸方言的變調。^⑬ *Sansalu* 指 *kadazan* 與卡達山語

⑤ Dayu Sansalu, *Kadazandusun Di Sabah: Pendidikan Dan Proses Pemodenan 1881-1967 (Kadazandusun in Sabah: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1881-1967)*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8), 386.

⑥ Ranjit Singh Darshan Singh, *The Making of Sabah 1865-1941: The Dynamics of Indigenous Society*, 289-290.

⑦ 卡達山杜順語。詞根 *Omot*，是割稻的意思，*Kaamatan* 是割稻的名詞化。

⑧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66-67.

⑨ Dayu Sansalu, *Kadazandusun Di Sabah: Pendidikan Dan Proses Pemodenan 1881-1967 (Kadazandusun in Sabah: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1881-1967)*, 383-385.

⑩ Dayu Sansalu, *Warisan Sejarah Kadazandusun (Heritage of Kadazandusun History)*, 53.

⑪ Dayu Sansalu, *Kadazandusun Di Sabah: Pendidikan Dan Proses Pemodenan 1881-1967 (Kadazandusun in Sabah: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1881-1967)*, 385.

⑫ *Kedai-an*，-an 是南島語系的處所焦點，直譯是「住在店裡的」。根據汶萊人「人 + [居住地]」的命名方式，*Orang Kedaian* 直譯就是「住在店裡的人」。

⑬ Anthony Reid, "Endangered Identity: Kadazan or Dusun in Sabah (East Malaysia)," 126-127.

kakadazan⁹⁴ 有關，指的是「商店」或「城區」的意思。⁹⁵ 反對者除了對卡達山這自稱感到陌生外，也可能不願承認自己過去相對於「城區」的「落後」形象。隨後，反對者模仿卡達山協會成立提倡杜順的文化協會⁹⁶，為後來卡達山民族主義的消逝埋下伏筆。

卡達山民族的「創造」，借鑒了華人的經驗。擁有雙重文化背景的 Sino-Kadazan，擔任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挪用華人底下的「方言群」劃分方式來為卡達山「正名」。當地人曾長 Fedelis Tan Ping Hing 強調：「沒有杜順，我們都是卡達山。……正如華人有海南人、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卡達山人也一樣，我們也有像 *Taga[h]as*、*Tangah*、*Lotud* 等分支，但我們都是卡達山人。」⁹⁷

在1930至1950年代，兵南邦縣卡達山人和華人的關係緊張，導致 Sino-Kadazan 選擇接近卡達山人。雖然高度通婚，但華商在當地的經濟活動影響土地使用和卡達山人的習俗。1937年，雙方曾就此發生衝突。⁹⁸ 這期間，當地曾長們多次希望特許公司限制華人的經濟活動，禁止華人在鄉村設商店，禁止華人借錢給當地人，改採用以物易物，惟政府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⁹⁹ 1960年，華人的人口增長至卡達山人人口的七成，¹⁰⁰ 掌握着重要的經濟命脈。隨着英國的解殖議程，卡達山菁英對華人的擔憂達到高峰；諷刺的是，當卡達山人進入到馬來西亞這個更高更大的權力架構時，卡達山人和華人頓時成了邊緣群體，兩者的緊張關係才大為緩和。

⁹⁴ *Kadai* (卡達山語) 是店，加上處所焦點-an，和名詞化前綴 k-，則延伸成「很多商店的地方」。

⁹⁵ Dayu Sansalu, *Warisan Sejarah Kadazandusun (Heritage of Kadazandusun History)*, 53.

⁹⁶ Dusun Lotud Association (of Tuaran)，成立於1960年。

⁹⁷ Donald Stephen, "DUSUN or KADAZAN?" in *The North Borneo News & Sabah Times*, 30th June, 1960.

⁹⁸ Danny Wong Tze Ken, "A Hybrid Community in East Malaysia: The Sino-Kadazans of Sabah and their Search for Identity," *Achipel* 84: (2012): 120-123.

⁹⁹ Ranjit Singh Darshan Singh, *The Making of Sabah 1865-1941: The Dynamics of Indigenous Society*, 292.

¹⁰⁰ Patricia Regis, "Demography," in *Sabah 25 Years Later, 1963-1988*, eds. Jeffrey G. Kitingan & Maximus J. Ongkili [Kota Kinabalu: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Sabah), 1989], 445.

三、馬來西亞聯邦政治下的原民性（1963年至今）

（一）土著（Bumiputera）

馬來西亞國族的想像可透過「土著」這概念，重組不同群體之間相對的邊緣地位。本小節的核心與邊緣，也呈現在馬來西亞的聯邦層級和沙巴的內部層級。國族主義和地方主義一直是沙巴的政治和文化認同主軸，儘管政黨和文化協會的名稱多變，仍離不開這一主軸。這些政黨在不同執政時期推行不同的原民性政策，且與聯邦政府關係時而疏遠（見附表5）。粗略地說，支持土著主義的多是非 KDMR 群，支持多元主義的多是 KDMR 群。沙巴華社多是以「造王者」自居，在不同關鍵時刻支持不同的理念。

1961年，沉睡中的沙巴政治環境，突然被一提案震醒——「大馬來西亞^⑩」（Greater Malaysia）提案。提案者來自南中國海另一端，是方才脫離英國殖民五年的馬來亞聯合邦。把馬來亞聯合邦、英屬新加坡、英屬砂拉越、英屬沙巴和英保護國汶萊^⑪共組成馬來西亞的提案，對沙巴來說或許突然，但是對當時的大英帝國、新加坡和馬來亞聯合邦來說，則討論已久，有着反共、解殖、資源分配、國族建構政策等多重考量。^⑫

為了回應此提議，卡達山協會轉型成為沙巴第一個政黨：卡達山民族統一機構（卡統，United National Kadazan Organisation, 1961-1964）。卡達山菁英隨後成立另一個文化協會——卡達山文化協會（Kadazan Cultural Association）。史蒂芬斯（Donald Stephen）成為卡統和卡達山文化協會的主席，亦被封為卡達山人的首任最高領袖（*Huguan Siou*）。史蒂芬斯帶領沙巴參與馬來西亞的成立過程，成為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長（Chief Minister）。

在1962年至1967年之間，卡統最大的競爭對手是「沙巴民族統一機構^⑬」（沙統，United Sabah National Organisation, 1961-1996）。兩個政黨所維護的主要群體不同：前者是以 KDMR 群為主，而後者則是非 KDMR 群為主。卡

⑩ 因此對馬來西亞華人而言馬來西亞的簡稱變成「大馬」。

⑪ 因為汶萊只是英國的保護國，英國必須徵詢汶萊蘇丹的意見，汶萊最終選擇不共組馬來西亞。

⑫ Zannial Ajamain, *The Queen's Obligation &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Report* (Kota Kinabalu: BruConn Sdn Bhd, 2015), 57-58.

⑬ 1996年，沙統解散，集體加入來自西馬的政黨：馬來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巫統）。

統和沙統對馬來西亞有着不同的國族想像，前者傾向於多元主義的國族；而後者傾向於和西馬融合。對於馬來西亞的提案，沙統一開始即無條件支持，因馬來亞聯合邦的國家政策和非 KDMR 群的理念幾乎一致，沙統支持伊斯蘭教和馬來語成為沙巴的官方宗教和語言。^⑩反觀，卡統早期因擔心馬來西亞將成為穆斯林主導的國家，而反對馬來西亞計劃。後因英國和馬來亞聯合邦承諾給予沙巴（和砂拉越）眾多保障（原住民、語言、宗教、文化等），卡統決定暫時放下歧見，和沙統合作，支持馬來西亞的提議。^⑪

馬來西亞的成立讓 KDMR 群和非 KDMR 群對於國族的想像進入到聯邦層級的核心與邊緣關係。馬來西亞成立之初，約82%的人口集中在西馬^⑫，馬來人與穆斯林當地人（40.6%）比華人（42.2%）略少。西馬主要執政黨巫統為了提升代表權，把非穆斯林當地人（5.5%）納入原本的40.6%，^⑬提出「土著」的概念。^⑭土著對應的是無法享有特別地位的華人、印度人等少數民族的群體。此外，聯邦政府可自行操作土著可含納的群體。和砂拉越當地人的定義相比（見附表6），沙巴的定義比較寬鬆，在特定條件下接納非原住民和原住民的混血兒。沙巴州憲法沒有明確列出民族名單，這為沙巴當地人的定義和民族生成帶來很大的彈性。

西馬的人口結構和它的夥伴們不同：沙巴和砂拉越多數是非馬來、非穆斯林的當地人，新加坡則是華人居多。這些地區的主要執政黨擁有不同的國族想像，發生了國族意識形態的衝突。沙統在巫統的滋養下壯大，和沙巴華人政黨共同排擠卡統。卡統則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合作，提倡「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⑮KDMR 群底下不同的文化認同成為兩種國族想像的角力場域。1964年，卡統進一步統合姆律人的政黨，成立「卡姆統^⑯」（United Pasok Momogun Kadazan Organisation, 1964-1967）；沙統則拉攏不認同卡達山的杜順勢力，成立沙巴杜順統一協會（United Sabah Dusun Association）。自

⑩ Margaret Roff, "The Rise and Demise of Kadazan Nationalism," 335.

⑪ Margaret Roff, "The Rise and Demise of Kadazan Nationalism," 333-334.

⑫ 筆者根據1957年和1970年新加坡及西馬人口，還有1960年沙巴和砂拉越人口估算。Ramesh Chander, *The Population of Malaysia* (Paris: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National Research in Demography, 1975), 9.

⑬ Gordon Paul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6), 429.

⑭ Margaret Roff, "The Rise and Demise of Kadazan Nationalism," 330.

⑮ Margaret Roff, "The Rise and Demise of Kadazan Nationalism," 340.

⑯ 全稱為卡達山巴索摩摩根統一機構。該姆律政黨是巴索摩摩根機構。卡統時期只開放黨籍給 KDMR 群，卡姆統時期開放黨籍給所有民族。

此，沙巴杜順統一協會成為與卡達山文化協會長期競爭的文化協會。^⑩ 1961年至1967年間沙巴兩種國族想像的合作團體見附表7。

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加劇卡姆統的邊緣性。面對巫統和沙統，卡姆統在一系列的權力鬥爭中妥協，「為了土著團結的利益」，^⑪ 史蒂芬斯於1967年宣佈解散卡姆統，鼓勵其黨員加入沙統，認同土著必須由馬來人和穆斯林來領導。沙統在1967年掌權後，實施土著化(*Bumiputeralization*)和伊斯蘭化的政策。需注意的是，土著化和馬來化之間仍存在差別，雖然兩者都認為土著應該由馬來人和穆斯林領導，但土著化允許穆斯林當地人認為自己的民族（如比薩雅人、巴瑤人等）是和馬來人平等且不同的。反觀，馬來化則是讓穆斯林當地人直接認同自己為馬來人。

在宗教方面，沙巴的基督宗教傳教活動被壓制，眾多外國神職人員被驅逐。1973年，伊斯蘭教成為沙巴的官方宗教。^⑫ 除了馬來語和英語，所有語言皆被禁止在大眾媒體使用。^⑬ 在一場場官方的「轉教儀式」上，幾千名非穆斯林當地人在各種手段和利誘下改信伊斯蘭教。^⑭ 在此期間，卡達山人脆弱的文化認同仍在卡達山文化協會底下維持。

1969年選舉後，西馬西海岸發生「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⑮，聯邦政府以彌補土著和華人經濟落差作為理由，一週後頒佈影響深遠的新經濟政策、新教育政策以及國家文化政策。土著在憲法所享有的權益進一步擴大成經濟和社會文化的領域，土著的特殊地位提升至「特別權利」(*special rights*)。柯嘉遜(*Kua Kia Soong*)認為，「『土著』不過是巫統新國家資本家在1970年以後所構思出來的詭計和意識形態，以便利利用新經濟政策來服務自己的議程」。^⑯ 土著私下是受惠巫統朋黨的概念；但表面上，聯邦政府透過政策，把土著這

^⑩ Anthony Reid, "Endangered Identity: Kadazan or Dusun in Sabah (East Malaysia)," 133.

^⑪ Margaret Roff, "The Rise and Demise of Kadazan Nationalism," 343.

^⑫ 砂拉越至今仍沒有官方宗教。參照 Anthony Reid, "Identity: Kadazan or Dusun in Sabah (East Malaysia)," 130。

^⑬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86.

^⑭ James Chin, "Second-class Bumiputera? The Taming of the Dayak and Kadazandusun of East Malaysia" in *Misplaced Democracy: Malaysian Politics and People*, ed. Sophie Lemièrre (Kuala Lumpur: SIRD, 2014), 122.

^⑮ 馬來西亞官方解釋此事件主要是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衝突，但對於其發生原因仍有其他論述。

^⑯ Kua Kia Soong, "Malaysia's Bumiputra Conundrum: An Elaborate Deception," 22th July, 2017,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389422>.

概念變成馬來西亞人生活中輕易感受到的「實體」，促進東馬當地人對土著的認同與嚮往。

沙統雖然推行符合聯邦的國族政策，但變得越來越專制與貪腐，甚至威脅吉隆坡要退出馬來西亞。當時的聯邦政府為了壓制沙統日益膨脹的地方主義，私下分裂沙統，聯合史蒂芬斯另組多元民族的新黨：沙巴人民黨(Sabah People's United Front)。在1976年的選舉中，人民黨獲得非穆斯林和部份穆斯林的支持，推翻沙統。這場選舉見證了 KDMR 群和華人之間的合作，兩群之前的緊張關係，在經歷伊斯蘭化和土著化的過程後，成為聯邦制度下的互相合作的邊緣群體。史蒂芬斯等卡達山領袖再度擔任首席部長等要職。兩個月後，史蒂芬斯及一半內閣死於一場空難；^{①⑨} 非 KDMR 群隨後主導內閣。人民黨在執政期間(1976-1985)，採取親聯邦的政策，沙巴的經濟得以發展。他們仍採取泛土著化和積極的伊斯蘭化政策，只是手段沒有沙統那麼激烈。^{②①}

建國後，沙巴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很大程度受到聯邦政府的牽制，重回到前殖民時期的邊緣地位。佔沙巴人口比例最高的卡達山人，在馬來西亞的結構下，突然變成邊緣少數。聯邦政府結合州內的穆斯林領袖有意識地進行土著化和伊斯蘭化的政策，也讓州內的非 KDMR 群回到權力的核心。

(二) 泛土著(Pribumi)

若說土著的概念是聯邦層級底下的產物，那「泛土著」的概念則是國際地緣政治下的產物。沙巴處於馬來西亞的地理邊緣，接近印尼北部和菲律賓南部。三國在蘇祿海的邊界防衛微弱。蘇祿海的人群自16世紀起即流動自如。同時，《當地人詮釋法》對蘇祿群島和印尼原住民的申請條件相對寬鬆。這導致1970至1990年代曾有大批菲南和印尼穆斯林透過非法的途徑成為非 KDMR 群，大大降低 KDMR 群的人口比例。

1970至1991年間，沙巴居民的人口比例發生巨變(見附表8)。^{②②} 卡達山和杜順的人口比例從三成降至兩成；印尼人和菲律賓人(含公民和非公民)則增長3.5倍。從1970年至2000年，馬來西亞的人口共增長113%，但沙巴卻

^{①⑨} Anthony Reid, "Endangered Identity: Kadazan or Dusun in Sabah (East Malaysia)," 131.

^{②①}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87.

^{②②} Patricia Regis, "Demography," 435, 443; Anthony Reid, "Endangered Identity: Kadazan or Dusun in Sabah (East Malaysia)," 124; DO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1), 71.

出奇地增長285%。學者詹運豪直指這並非自然增長，肯定是大批移民的歸化，欲讓沙巴成為穆斯林居多的州屬。^⑫沙巴的穆斯林人口也從1963年的37%提升至2006年的63.7%。

來自菲律賓和印尼的「非法穆斯林公民」，都和沙巴漢的認同或地方主義緊密相連。^⑬作為邊地，移民的大舉湧入是影響沙巴物質生活最重要的元素。^⑭這些移民的出現為沙巴的社會資源與治安觀感造成極大的壓力，^⑮也造成沙巴漢（尤其是 KDMR 群）的反感。如此共享的生活經驗，對沙巴各個群體和縣市來說是獨特的，反而促成了沙巴漢的認同，是政治邊地認同的特徵之一。^⑯

「泛土著」的議程是在此脈絡下展開，與伊斯蘭教的關聯性強。人民黨的第二任任期（1981-1985）被視為是貪腐且專制。其領導人哈里斯(Harris Salleh)為了迎合巫統的土著主義，放任甚至鼓勵鄰國穆斯林的移民，一場場轉教儀式在1981至1984年間舉行。^⑰哈里斯清楚一群受過教育的 KDMR 群對「土著」一詞感到敏感，於是借用印尼政府使用的 *Pribumi*（本文稱「泛土著」）一詞來指涉「馬來人和相關的人群」，包括這些來自菲南和印尼的新移民。

面對泛土著化和伊斯蘭化，卡達山人和杜順人的領袖停止多年的爭吵，發起「卡達山杜順民族主義」(Kadazandusun Nationalism)。這時的卡達山文化協會主席、時任副首席部長拜林(Joseph Pairin Kitingan)於1984年受封為卡達山人的「最高領袖」，也是史蒂芬斯逝世後的「繼承人」。1985年的州選

^⑫ James Chin, "Second-class Bumiputera? The Taming of the Dayak and Kadazandusun of East Malaysia," 115-116.

^⑬ Flory Mansor Gingging, *Being Kadazandusun in Sabah, Malaysia* (PhD.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2013), 170-178;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103-128; Ryan Keller, *Identity Formation in Sabah, Malaysia: Resistance and Negotiation of the Dominant State Narrative*, 51-60.

^⑭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106.

^⑮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104; Patricia Regis, "Demography," 424.

^⑯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105, 107.

^⑰ Regina Lim, *Federal-State Relations in Sabah, Malaysia: The Berjaya Administration, 1976-1985*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111, 115.

舉，拜林帶着新成立的沙巴團結黨(United Sabah Party)^⑫ 贏得州政權。

同時，受過高等教育的杜順社群在基督新教的協助下，羅馬化另一套文字系統，不停要求為杜順正名。^⑬ 粗略地說，卡達山人的認同和天主教相關，而杜順人的認同則與基督新教相關。無法強勢的卡達山人於1989年妥協，卡達山文化協會改稱「卡達山杜順文化協會」(Kadazan Dusun Cultural Association)。1995年，卡達山杜順文化協會和沙巴杜順統一協會終於同意合稱為「卡達山杜順」群(Kadazandusun)，制定結合兩套發音系統的卡達山杜順語。^⑭

時隔18年，KDMR 群再次回到權力的中心，團結黨為了穩定政局加入聯邦執政聯盟國陣。^⑮ 但礙於拜林鮮明的天主教徒和卡達山杜順認同，聯邦政府處處對沙巴給予經濟上的刁難。1990年選舉期間，國陣面對強大的在野聯盟挑戰，團結黨瞄準時機，退出國陣，加入聯邦在野聯盟。然而，此聯盟未能贏取聯邦政權。贏得沙巴州政權的團結黨政府成為聯邦的在野政府，面對聯邦政府更強大的「報復」。^⑯ 此時期的州與聯邦層級呈現相反的邊緣性，在州層級裡非 KDMR 群和在聯邦層級裡 KDMR 群皆處於邊緣。

為了永遠弱化沙巴的地方主義和反聯邦的情緒，聯邦政府於1985年開啟有系統地提升穆斯林人口的「身份證計劃」(Project IC)，即透過分發公民權給非法移民而換取國陣的選票。唯一有權力分發身份證的單位是由聯邦控制的國民登記局，而當時負責管轄此部門的內政部部长就是時任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mad)。^⑰ 因此此計劃也被稱為「M 計劃」，取自馬哈迪的名字。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沙巴的非公民人數多達27.7%，這數字仍未計算所謂的「非法公民」。

種種計劃把 KDMR 群再度從州層級上的核心變成邊緣。作為報復的手段之一，「沙巴政黨管沙巴」潛規矩就此打破，源自西馬的巫統等國陣政黨「東渡」沙巴，試圖直接管理沙巴。1994年團結黨險勝國陣，後因國陣政治

⑫ 多元主義政黨，成立於1985年，至今仍活躍於政壇。

⑬ Anthony Reid, "Endangered Identity: Kadazan or Dusun in Sabah (East Malaysia)," 133.

⑭ Anthony Reid, "Endangered Identity: Kadazan or Dusun in Sabah (East Malaysia)," 136.

⑮ 馬來西亞長期執政的聯盟(1974-2018)，全稱國民陣線，其前身是聯盟(1957-1974)執政西馬。

⑯ James Chin, "Second-class Bumiputera? The Taming of the Dayak and Kadazandusun of East Malaysia," 115.

⑰ James Chin, "Second-class Bumiputera? The Taming of the Dayak and Kadazandusun of East Malaysia," 115.

賄賂大批團結黨議員倒戈。^⑬ 團結黨政府垮臺，國陣就此執政沙巴至2018年。

在進入最後一個概念羣叢(*Rumpun*)之前，筆者把前述的原民性概念繪製成示意圖，見附圖5。圖中虛線顯示的是未有法律定義的概念，如土著、泛土著以及 KDMR 群。泛土著包含土著沒有涵蓋的「非法公民」。沙巴當地人和原住民的差別在於，前者包含 Sino-Kadazan、原住民和其他馬來群島原住民的通婚後代，原住民則包含 KDMR 群和非 KDMR 群。

聯邦政府對沙巴的干預，體現在借助跨國移民力量的「身份證計劃」和透過政治和經濟對沙巴本土政黨的打壓上。如此的共同經驗造成沙巴各群體對於所謂「西馬人」和「非法公民」這兩種「外來者」的謹慎態度。這共同經驗和情感進而促進「沙巴漢」這個跨越當地人和非當地人的地方認同。^⑭ 這兩個群體皆建立沙巴在聯邦層級的邊緣性，西馬人是直接來自核心地區的人群；而非法移民則是來自其他國度的邊緣群體，但在土著主義下轉換成馬來西亞的核心群體。

如此聯邦層級的邊緣性以及外部的干預，造就沙巴漢的地方認同。這種地方認同間接削弱當地的原民性，尤其是當地人對於土著特別權利(*special privilege*)^⑮的重視。2017年的一份民調顯示，高達55%的沙巴漢（含54%的穆斯林）認為所有沙巴漢應該被公平對待，只有45%認為特別權利應該保留給土著。^⑯ 這份民調發現有高達63%的沙巴公民首先以「沙巴漢」自居，僅有27%以「馬來西亞人」為先。反而在西馬，同批調查揭示55%的西馬人的認同以各自的宗教為先。同時，西馬馬來人對特別權力的主張在希望聯盟（希盟^⑰）上臺後特別明顯。尤其是希盟政府欲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的舉動，引發馬來—穆斯林團體的極大不安。他們認為此公約會破壞馬來特權(Malay Privilege)和伊斯蘭的優勢(Islam superiority)。^⑱

⑬ James Chin, "Second-class Bumiputera? The Taming of the Dayak and Kadazandusun of East Malaysia," 115.

⑭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29, 107, 128.

⑮ 是比聯邦憲法所定義的特殊地位(*special position*)更多的權利。

⑯ Lee Hock Guan, *Borneo Survey: Autonomy, Identity, Islam and Language/Education in Sabah*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2018), 8.

⑰ Alliance of Hope, 2015年9月成立，是由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國家誠信黨和土著團結黨（2020年2月退出）組成的政治聯盟。

⑱ KOMAS, *Malaysia Racial Discrimination Report (Petaling Jaya: Pusat KOMAS, 2019)*, 5.

簡言之，沙巴和西馬在同一時間軸上，因為核心與邊緣性，以及外部力量的干涉等因素，對於原民性的強調呈現完全相反的方向。沙巴當地人對原民性的強調削弱，卻轉換成地方主義，即沙巴漢的認同；而西馬來人對原民性更加強調，並和伊斯蘭教密不可分。

（三）羣叢

羣叢這一概念並非指涉原民性，而是協助理解原民性的工具，尤其地方主義者如何利用羣叢這一概念回應土著主義。羣叢的概念源自當地人對植物的理解，接着輔以親屬觀，再應用在人群分類上。此概念一開始是用來理解發生在1999年之後 Barlocco 所稱的「後族群」現象(Post-ethnic phenomenon)，^⑭即 KDMR 群這種想像的共同體碎片化或更完整化的開端。2008年後，穆斯林當地人似乎也呈現類似的趨勢；筆者將之詮釋為穆斯林當地人抗拒「馬來化」的趨勢。

馬來語的羣叢有兩種主要意義：其一，看起來同根（因為子株不斷生長）的植物群(clump)，如竹叢和稻叢；其二，擁有同一個祖先，同祖籍的人群，同樣源頭和種類的民族（或語言）大群。^⑮比起父子或母子關係，島嶼東南亞南島社會強調同胞情誼(siblingship)^⑯對家屋(house)團結的重要性。^⑰島嶼東南亞「中心型社會」(Centrist Society)^⑱借用同根植物群來隱喻自身的親屬觀，不斷繁衍的子株則是離根部越來越疏遠的「同胞」，位於中心的根部代表共同的祖先。此概念也延伸至民族之間，用於形容「民族大群」。面對不斷「生長」的民族，與其強調民族的源頭，南島語族更強調子株或民

^⑭ Fausto Barlocco,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he Kadazan of Sabah (East Malaysia)*, 99.

^⑮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amus Dewan Edisi Keempat: Rumpun," 2017, <http://prpm.dbp.gov.my/CarianBestari?mode=ext&keyword=rumpun>.

^⑯ 不譯為手足。手足是 zero-degree siblings，第一表親是 first-degree siblings，第二表親是 second-degree siblings，以此類推。

^⑰ Janet Carsten, "The Substance of Kinship and the Heat of the Hearth: Feeding, Personhood, and Relatedness among Malays in Pulau Langkawi," *American Ethnologist* 23: 2 (1995): 226; 蔣斌，〈墓葬與襲名：排灣族的兩個記憶機制〉，載黃應貴編，《時間、歷史和記憶》（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386。

^⑱ 存在於馬來半島、婆羅洲、爪哇、蘇拉威西、菲律賓與北摩鹿加群島的南島語族。此社會的家屋存在中心與邊緣的階序性關係。家屋的中心傾向和表親通婚，被視為是較疏遠同胞的表親得以於中心再生產。Shelly Errington, *Meaning and Power in a Southeast Asian Real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5.

族類似同胞的同等地位。

羣叢也是地方主義者回應政府文化認同政策的方式。沙巴當地人透過不斷碎片化或生成的方式來回應伊斯蘭化和馬來化。筆者認為，他們避免將全部群體統一在一個民族之下。因為他們認為，若全部群體統一為一個民族，而此民族被官方操作而同化成馬來人或穆斯林將「萬劫不復」。因此，他們採取官方人群劃分定義上民族的獨立，卻透過羣叢這比官方定義更高階的民族大群來連結彼此。KDMR 群開始強調「卡達山杜順群」(*Rumpun Kadazandusun*)、「KDM 群」(*Rumpun KDM*)或「KDMR 群」(*Rumpun KDMR*)；非 KDMR 群則強調「馬來群」(*Rumpun Melayu*)，避免自己成為「馬來民族」(*Bangsa Melayu*)或「馬來族裔」(*Etnik Melayu*)的一份子。

此現象首先發生在國陣執政沙巴的兩個時期：巫統與其他國陣成員黨輪流執政（1994-2004）時期和巫統一黨獨大（2004-2018）時期。前者指的是巫統和其他沙巴國陣成員黨每兩年輪流擔任首席部長；而後者則是巫統長期擔任首席部長，掌握沙巴過半議席。從文化認同的面向上，沙巴國陣在上半時期鼓吹馬來化政策，鼓勵穆斯林當地人成為「馬來人」；但在下半時期則緩和至土著化的政策：強調自己是土著或馬來群的同時，容忍穆斯林當地人成立各自的文化協會，進行文化再造運動。筆者認為，轉變的關鍵在於馬哈迪的首次卸任（2003），以及沙巴國陣政權因團結黨的回歸而變得十分穩定，無需透過增加馬來人來換取選票。2008年的選舉，國陣失去修憲的議席門檻，同時失去四個西馬州政權^⑭。其中，東馬國陣成員黨「貢獻」39%的國陣總體議席，成為保權的大功臣；來自東馬的內閣成員比例也因此增加。^⑮東馬政黨陸續挑起眾多東馬議題，讓東馬自主權的議題自此發酵。^⑯沙巴當地人的文化認同因此受重視，弱勢的首相無法透過聯邦的力量進一步馬來化沙巴當地人。

當地人同化政策的轉向也反映在沙巴馬來人的比例：從1991年的6.2%，提升至2000年的11.7%，再降至2010年的5.7%（見附表7）。雖然沒有相關學者針對此現象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根據筆者觀察，2010年的人口普查多了

⑭ 分別是檳城、吉打、霹靂和雪蘭莪，加上1999年由在野黨伊斯蘭黨執政的吉蘭丹。

⑮ 當今大馬，〈阿都拉內閣瘦身只減1部門，廢除次長團隊劇降至68人〉，《當今大馬》，2008年3月18日，<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79998>。

⑯ 康世人，〈沙巴進步黨退出馬國執政聯盟，點燃政壇風暴〉，《大紀元》，2008年9月17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8/9/17/n2266469.htm>。

汶萊人、*Balabak/Molbog* 和 *Bulongan*^⑭ 三類在2000年普查所沒有的民族。^⑮ 筆者認為，這三個民族過去都被歸納成馬來人，但他們在2010年不接受此歸納，導致馬來人比例下降。

受到挑戰的不僅是在穆斯林當地人範疇下的馬來人核心地位，還包括非穆斯林當地人之下卡達山杜順人的核心地位。1990年代末，卡達山杜順人的正統性受到其他「方言群」的挑戰，要求成為和卡達山杜順人同等級的民族。^⑯ 其中，龍骨斯人和塔達那人(Tatana)^⑰ 成功向沙巴文化局申請脫離卡達山杜順人，成為「獨立」的民族。如此碎片化的過程似乎發自民間，KDM的使用源自1999年選舉前的一名專欄作家，^⑱ 五個月後，一本土國陣成員黨借用此名，改稱「沙巴卡達山杜順姆律民族統一機構」(民統，*United Pasokmomogun Kadazandusun Murut Organization*)^⑲，正式正統化 KDM 一詞。卡達山杜順民族主義因此消逝，開啟 KDMR 各方言群文化再造運動的旅程。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並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比例超過20%，這也讓沙巴的原民性沒有被一強勢民族引領方向，進而減弱沙巴原民性的強調。^⑳

2018年大選，馬來西亞聯邦層級實踐首次的政黨輪替，由四黨聯合組成的聯盟希盟執政。國陣執政的沙巴州政府也因此倒臺，改由沙巴政黨民族復興黨(*Sabah Heritage Party*，民興黨)及民統和希盟成員黨(人民公正黨和民主行動黨)聯合執政。民興黨的州政府與希盟的聯邦政府關係密切，採取比國陣時期更加多元及世俗的政策。然而，和卡姆統時期(1963-1967)及團結黨時期(1985-1994)相比，民興黨的多元民族文化認同政策不再側重於西海

⑭ *Balabak/Molbog* 來自菲律賓賓巴拉望島(Palawan)，目前居住在沙巴北部，有自己的文化協會(*Persatuan Etnik Molbog*)。*Bulongan* 來自印尼北加里曼丹省，過去是 *Bulungan* 蘇丹王國的子民，目前居住在沙巴的斗湖縣。

⑮ DO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Putrajay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0), 129.

⑯ Raymond Majumah, *Rungus: Peribumi Momogun Sabah (Rungus: Momogun native of Sabah)*, 31-32.

⑰ 龍骨斯人和塔達那人皆在2010年代脫離。

⑱ Jeannet Stephen, "The Value of Ethnic Labels in Relation to Ethnic Identity in Sabah: The Case of the Kadazandusuns," in *The Borneo 2000: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Biennial Borneo Research Conference* (Kuching: University Malaysia Sarawak, 2000), 1.

⑲ 注意此英文縮寫 UPKO 和卡姆統一模一樣。民統聲稱繼承了卡姆統的精神，英文全稱只多了 -dusun 和 Murut。2019年，其英文名稱改為 *United Progressive Kinabalu Organisation*，中文縮寫維持一樣。

⑳ DO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71.

岸。

民興黨的主要勢力在長期被邊緣化的沙巴東海岸。此地也是大部份非 KDMR 群的集聚之地，有着大量印尼和菲律賓移民的後裔。民興黨的執政引發西海岸 KDMR 群的不安，擔心東海岸大批的非法移民會透過民興黨的內部關係而合法化。2019年，民興黨政府欲對長居沙巴的政治難民及非法移民的後代推動「沙巴臨時準證」，方便人口流動的管理。「沙巴臨時準證」議題加上馬哈迪的二度拜相（2018-2020）引發民間對重啟「身份證計劃」的擔憂。^⑮

民興黨深知自身「親移民」^⑯的觀感，極力提倡多元民族及沙巴漢的認同感，以爭取西海岸 KDMR 群的支持。2019年所舉辦的馬來西亞日嘉年華會強調的是多元民族和宗教共存共榮的精神。這嘉年華邀請了30個不同宗教與文化的社區組織，主辦人 Dusing 在致辭中強調：「在沙巴，我們拒絕所有形式的極端主義、種族主義、仇恨及暴力。」^⑰這無形間透露了地方主義和多元主義的結合。接下來，筆者將透過世界原住民日（World Indigenous People Day）這一民族誌案例，來闡述沙巴當代的原民性。

2018年8月8日至9日，克洛克山脈^⑱的小鎮九魯（Kiulu）吸引了上千人前來。這裡是杜順人的大本營，山脈把他們和靠海平原的卡達山人隔閡，形成所謂的核心與邊緣關係（見附圖6）。新政府新作風，這是沙巴州政府首次舉辦世界原住民日，由民統主導。在這後族群時代，參展的文化協會近20個，含東西兩岸的非 KDMR 群。之中，有八個文化協會成立於2008年或之後^⑲，選擇同盟於卡達山杜順文化協會。他們稱同盟成員為團體成員（Group member），是馬來西亞社團法令下的成員類別。^⑳筆者認為，這好比同胞的

⑮ 〈「臨時準證」成最大關鍵 3大要素定金馬利補選勝負〉，《詩華日報》，2020年1月19日，<http://news.seehua.com/?p=517129>。

⑯ 主張讓大批長居沙巴的非法移民或無國籍的移民後裔自然歸化成為合法的工作證持有者、永久居民或是公民。對應的「反移民」則主張採取嚴格標準，把這些非法移民或移民後裔遣送回菲律賓或印尼，或僅持有難民證，同時提高他們獲取合法拘留證件或公民的標準。

⑰ “All Rise for Unity of Diverse Cultures,” *The Star*, 16th September, 2019,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9/09/16/all-rise-for-unity-of-diverse-cultures>.

⑱ Crocker Range，沿着沙巴西海岸的山脈，是馬來西亞最高的山脈（平均高度1800米），馬來群島最高的山神山（Mount Kinabalu，4095米）坐落於此。

⑲ 其中包括 Lotud（2009）、Tatana（2010）、Rungus（2014）、Dumpas（2015）、Sandayo（2015）、Tinagas（2016）、Kuaju、Gana Nabai（2016）、Sonsogon（2016）和 Liwan（2017）。

⑳ KDCA, “About Us: Memberships,” 2019, <http://www.kdca.org.my/about/memberships>.

關係，惟「同胞的大哥」仍是卡達山杜順文化協會。由此可見，羣叢的概念隨着眾多文化再造運動已轉移到文化協會的層面。

這一州級慶典也試圖平衡東海岸的邊緣性，讓東海岸的當地人共襄盛舉。和着重於西海岸 KDMR 群的豐收節活動相比，此節慶更強調沙巴當地人的原民性。8日晚上，沙巴文化局、州立博物館等機構也主辦關於聯合國文化遺產以及世界原住民權利的講座，回應聯合國於2007年所提出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⑩ 有一民眾曾就沙巴的後族群現象詢問，能否明確列下沙巴所有的當地人民族名單，避免非當地人能夠乘虛而入；同時建議為 KDMR 群的統稱定案。然而，主講者 Monih Epin 亦承認這是個棘手的提問，他無法代表所有人回答。

事實上，Monih Epin 正是來自剛剛脫離卡達山杜順人的塔達那社群。他在闡述當地人母語保存的面向時，曾說：「雖然現在學校已經有教卡達山杜順語，但是發音和語法是以 Bunduliwan 方言為準，其他地區的方言是否得以保存也是值得關注的事。」就塔達那語而言，它的發音和語法與官方的卡達山杜順語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別，若僅是附屬在卡達山杜順人之下，反而會不利於塔達那語的保存。因此，他能了解塔達那人選擇「獨立」的原因，但又必須顧慮在場卡達山杜順人代表的立場，進而避開對話的機制。

隔天的開幕典禮除了有官方致辭，也有文娛表演。其中一首 *Original Sabahan*（道地沙巴漢）的歌曲，大受現場民眾的歡迎。如何定義「道地沙巴漢」？歌詞其實隱藏了當地人的非類屬性文化認同。在音樂錄影帶裡，歌手面對朋友的質疑，透過行動來證明自己的「道地性」：背着重物遊走地景，如家鄉附近的山河，以示他與居住地的行為連結與熟悉度；說母語的流暢度，用口音腔調來證明自己來自的居住地。^⑪ 歌曲受歡迎的程度，印證日常生活面向的非類屬性模式。歌詞強調的是「沙巴漢」的認同，而非當地人或原住民的層次。這代表原先屬於當地人的非類屬性模式，逐漸滲入沙巴漢這個更廣大、更具包容性的範疇裡。這也顯示沙巴的原民性逐漸轉入地方認同裡。

當地傾向於用語言流暢度和口音來辨認彼此，而非外表（如膚色）和祖

⑩ Chris Maskilone, "World Indigenous Day from Aug 8-9 in Kiulu," *Sabah News Today*, 8th August, 2018, <http://www.sabahnewstoday.com/en/world-indigenous-day-from-aug-8-9-in-kiulu/>.

⑪ 吳佳翰，〈如何定義「道地沙巴人」〉，《當今大馬》，2019年1月16日，<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60471>。

籍。這也能透過筆者在參與該講座的經驗得知。筆者用沙巴口音的馬來語和坐在前排的兩位杜順阿姨聊天。直到筆者和父親說華語的時候，她們才突然醒覺筆者是華人。換句話說，在聽見筆者流暢的華語之前，她們從馬來語的流暢度與口音判斷，認為筆者和他們共享着高度的「原民性」。

當晚也來了一位民興黨的候選人祖安娜(Jo-Anna Sue Henley Rampas)。這位政治人物是前述兩位阿姨的親戚，來自同一個村莊。祖安娜的父親是英國人，有着精緻深邃的五官與白皙的皮膚。嚴格來說，她應屬於早期人口普查的「歐亞裔」(Eurasian)。但在兩位阿姨的眼裡，她因為從小在杜順村莊長大，講得一口流利的卡達山杜順語，與她們共享着一套習慣法，曾經出過卡達山杜順歌唱專輯，因此完全能被 KDMR 群接納。^{⑩3}

簡言之，羣叢的概念在1999年開始抬頭，作為反土著主義的一種策略。同時，它也進一步瓦解卡達山民族主義以來，兵南邦縣卡達山方言群作為 KDMR 群核心的思維。碎片化的同時，也有部份 KDMR 群嘗試效仿砂拉越的達雅人，採民族等級的統稱來回應土著主義。如南婆羅洲的 Meratus Dayak，他們對於統稱無法取得共識，有的建議使用「卡達山杜順姆律」、「卡達山杜順姆律龍骨斯」(KDMR)或歷史悠久的名稱「摩摩根」(Momogun)^{⑩4}。眾多的統稱進一步分散彼此的力量，進而助長羣叢概念和後族群現象。

四、討論：邊緣性與原民性

(一) 邊緣性和文化認同

沙巴的原民性可略分為文化認同和宗教兩個元素。此原民性生於殖民時期，但基於前殖民時期的非類屬性文化認同。非類屬性模式解釋了沙巴原民性多重且流動的面向。之前的研究忽略此面向，無法用西方學者常用的類屬

^{⑩3} Muguntan Vanar and Natasha Joibi, "Beauty Queen Rampas out to Steal Hearts of Voters in Kiulu, Sabah," *The Star*, 16th April, 2018,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8/04/16/beauty-queen-rampas-out-to-steal-hearts-of-voters-in-kiulu-sabah/>.

^{⑩4} 2015年後，有人成立文化協會 Momogun National Congress，想把 KDMR 群的名字統一成 Momogun。見 Casey Lee, "Kadazandusuns in Sabah may change their name? Here's what it is," 5th February, 2017, <http://cilisos.my/are-the-kadazandusuns-of-sabah-getting-a-new-name/>；黃志彬，〈「摩摩根」族名爭議白熱化/沙原住民社會何去何從？〉，《華僑日報》，2016年12月25日，<http://www.ocdn.com.my/news.cfm?NewsID=64750>。

性文化認同（或族群性）全面理解。汶萊和蘇祿王朝透過代理人的方式間接治理沙巴，彼此政經關係具有核心和邊緣之差。汶萊人作為核心群體，其命名方式隨後被殖民者借用。

殖民者所引入的原民性多是為了行政方便，讓原住民保留原有的制度，同時也方便習俗地管理。殖民者把基於繼嗣和血統的類屬性文化認同帶入殖民政策，沙巴原民性就此呈現非類屬性和類屬性的混雜狀態。在特許公司管理期間，當地人這原民性比較傾向於國籍的範疇，同時可因政策而變。戰後，英政府才把當地人視為具有生物性的類屬性類別。這時期沙巴的邊緣性較低，但仍受英國這核心殖民母國的殖民知識影響。大量引入的華人引發當地人的擔憂，也激發當地人對原民性的強調。

教育、宗教和親屬的資源能夠改變原民性的方向，以及政治和經濟邊緣群體的地位。教會學校、天主教教會和與華人的通婚讓原本處於邊緣的卡達山人發起民族主義運動，進而翻轉成帶領沙巴參組馬來西亞的核心群體。透過外部力量的翻轉定義沙巴在1950至1960年代的原民性：應以卡達山人和天主教為主。同時，國族國家內部權力架構的改變，足以改變邊緣地區的原民性。馬來西亞建國初期的原民性介於土著主義和多元主義之間。新加坡的退出定義沙巴的邊緣性，而其原民性必須受到馬來化和伊斯蘭化的長期影響。

原民性更不受限於國族國家內部，為了弱化邊緣群體民族主義的反撲，國族國家的核心善用地緣政治的邊緣群體，進而改變邊緣地區的人口結構，讓邊緣地區的原民性更加核心化。泛土著的提倡和身份證計劃是透過鄰國邊緣群體的大量引入，加強沙巴原民性的方向，使之更伊斯蘭化和馬來化。本來，人口遷移的政策較容易透過遷移國內核心地區的主要群體而達成。但《1963年馬來西亞協定》所賦予沙巴的移民權，讓沙巴能夠避開國內的人口遷移議程。然而，沙巴沒有自主的公民權，讓改變人口結構的議程必須藉由鄰國群體的移入而達致。

原民性的形塑除了受到外部力量的影響，也會受到文化群體理解社會世界和整理自身經驗的影響。如沙巴原民性除了有非類屬性文化認同的基礎，也有羣叢的文化邏輯。羣叢是從植物群延伸至民族和文化協會關係的概念。它允許民族如子株般不斷生成，與非類屬文化認同概念結合。即使沙巴原民性受到土著和泛土著兩個政治概念的干預，仍無法統一在一個名稱下。殖民前，沙巴不似西馬沒有統一的政權（如馬六甲王朝），沒有政治打造的統一認同，人們對統一名稱無法取得共識，以致民族一直不斷碎片化。恰好，碎片化也能回應核心地區所致力於伊斯蘭化和馬來化議程。多元在近期成為沙

巴漢認同論述自己的角度。西馬人和非法移民的日常經驗所打造的沙巴漢認同，進而弱化沙巴當地人對原民性的強調。核心對邊緣地區強加的原民性，讓邊緣地區的地方主義增強，進而削弱自身對原民性的強調。

（二）邊緣性和宗教

宗教是探討沙巴原民性的第二個元素。英殖民時期，沙巴呈現高度的宗教自由及平等，並無官方宗教。基督宗教因屬於殖民者的宗教而在民間受到推崇，信徒在1951年（8.7%）至1960年（16.6%）間翻倍。但英國官員並沒有透過政治力量，讓英國國教（Anglicanism）的地位高於其他宗教或教派。反之，天主教因較早傳入而在 KDMR 群裡較佔優勢。據1960年的統計，佔當地人信仰比例最高的是伊斯蘭教（45%），基督宗教則佔14.55%。^⑩ 儘管如此，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當時並無明顯的核心和邊緣關係。

邊緣地區的原民性容易受到核心地區的宗教影響。沙巴原民性和宗教的鑲嵌與馬來西亞的建國有關。沙巴在談判共組馬來西亞時，維持沒有州官方宗教的條件，惟承認伊斯蘭教是聯邦的官方宗教。卡姆統（1963-1967）和部份團結黨（1985-1994）黨要皆維持以上主張，在執政期間沒有落實伊斯蘭化政策。如上所說，沙統（1967-1976）認為的沙巴原民性應和政治核心地區（西馬）一樣，因此開啟強烈的伊斯蘭化政策。當時，沙巴伊斯蘭化的強度甚至比西馬嚴重。

宗教與原民性的關聯也受到國際宗教運動的影響。1970年代，馬來西亞受到世界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影響。人民黨（1976-1985）仍認為沙巴原民性（泛土著）應與伊斯蘭教相關。這時期的積極伊斯蘭化政策是和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鑲嵌的。^⑪ 在聯邦層次，雖然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國教，但建國之初採用「政教制衡」體制，伊斯蘭教和原民性的關聯不大。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馬哈迪在首次任相期間（1981-2003）導引至「以政領教」體制。馬哈迪的繼承者則保留類似的伊斯蘭化政策，鼓吹伊斯蘭思想和文明，尤其和原民性掛鉤，「為馬來民族主義尋找一個信仰的出路」。^⑫

^⑩ Lawrence Walter Jones, *North Borneo, Census of Population Taken on 10th August 1960, Additional tables*, 98.

^⑪ Regina Lim, *Federal-State Relations in Sabah, Malaysia: The Berjaya Administration, 1976-1985*, 122.

^⑫ 陳中和，〈族群認同與宗教運動在國家政策的運用：初探馬來西亞巫統文明伊斯蘭（Islam Hadhari）運動〉，《臺灣東南亞學刊》，第2卷，第2期（2005年10月），頁120。

國際運動、聯邦和地方政府層次的政策影響，讓與原民性掛鉤的宗教成為邊緣地區的核心宗教，同時也引發邊緣宗教群體的反彈。1980年，沙巴的穆斯林人口剛好過半（51%），^⑩足以引發地方主義者，尤其是 KDMR 群的不安。他們過去大部份信仰祖靈信仰(Pagan)，卻在核心宗教迅速發展之際，選擇改信基督宗教。1960年只有約24%的 KDMR 群信奉基督宗教，這比例在2010年增加至75%。^⑪換言之，基督宗教已經和 KDMR 群的原民性掛鉤，而伊斯蘭教則和非 KDMR 群的原民性掛鉤。

邊緣地區的地方主義，能緩和核心宗教與原民性的掛鉤強度。卡達山杜順民族主義的崛起，以及隨後的羣叢概念下所形成的多元主義，緩和了沙巴伊斯蘭化的速度。在團結黨倒臺後的國陣時期，沙巴的伊斯蘭化政策雖然仍是主要議程，但和沙統及人民黨時期相比已屬非積極。^⑫這體現在國陣州政府仍把資源投入在清真寺的建設，州內代表性的建築也有明顯的伊斯蘭風格。

2018年後的泛民興黨政府，為了贏取西海岸 KDMR 群的支持，伊斯蘭化政策轉入被動形態。雖然仍承認伊斯蘭教是沙巴的官方宗教，卻無大型伊斯蘭風格的建築物，甚至宣佈平安夜為公共假期。這意味着，沙巴也是全馬唯一州屬讓聖誕節和開齋節擁有連續兩天的假期。^⑬近年來，隨着文化認同和宗教兩元素與沙巴原民性的關聯逐漸轉弱。沙巴原民性已經轉入地方認同（沙巴漢）的強調。

伊斯蘭化政策如何影響沙巴原民性，可以透過以下田野實例印證。在沙巴，語言非常接近的族群，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來區隔彼此並非罕見，如在沙巴東北部的雙溪人和擔巴諾人(Tambanuo)的語言非常接近，但是穆斯林傾向於前者，非穆斯林則傾向後者。

同理，所有田野報導人皆提出比薩雅人和塔達那人的語言非常相似，過去曾是同一族。在汶萊王朝時期，宗教司把伊斯蘭教傳給比薩雅人後，非穆斯林的一方則自稱塔達那人。然而，這樣的劃分在過去應以非類屬性文化認

^⑩ Regina Lim, *Federal-State Relations in Sabah, Malaysia: The Berjaya Administration, 1976-1985*, 115.

^⑪ 無法獲取龍骨斯人和比較小的 KDMR 群民族的資料。

^⑫ Regina Lim, *Federal-State Relations in Sabah, Malaysia: The Berjaya Administration, 1976-1985*, 130.

^⑬ 黃忠良，〈聖誕放假2天·沙基督徒最珍貴禮物〉，《星洲日報》，2019年12月12日，http://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161012.html。

同為準，兩族因生活方式而不同，但具有雙向的認同流動性。報導人在敘述家族史時，曾提出比薩雅婦女嫁給塔達那丈夫後，需追隨丈夫的生活方式，認同因此流動成塔達那婦女。相反，塔達那婦女嫁給比薩雅丈夫後，也會被社群接受成比薩雅婦女。在20世紀中葉以前，跨宗教的通婚一般上以丈夫的生活方式為準。

然而，1980年代起，聯邦政府採用「以政領教」體制，凡是和穆斯林通婚的女性或男性，都必須改信伊斯蘭教。改教者的生活方式受到政府單位的監察，比薩雅和塔達那之間的認同流動性遭到制止。然而，與比薩雅人通婚的塔達那男性或女性並沒有因穆斯林的生活方式而成為比薩雅人，反而各自保留原本的族裔，形成官方登記上「穆斯林塔達那人」的新可能。

「穆斯林塔達那人」沒有自願在官方登記上成為「比薩雅人」，很大的原因和1980年代末沙巴地方主義的高漲有關。如前述般，地方主義抵抗伊斯蘭化和馬來化的進程。因此，改教者不願追隨過去非類屬性文化認同的標準，不願成為比薩雅人。筆者曾在2018年遇見比薩雅地方領袖 Dikin Musah，因其所屬的人民公正黨提倡多元文化主義，因此他堅持當地人不會因為改教而改變其文化認同。身為穆斯林的他說，現在的塔達那人改信伊斯蘭教後，不會成為比薩雅人或是馬來人，雖然這在過去是行得通的。他強調改變的只是宗教，而不是族裔(ethnic)。

在塔達那人那一方，為了避免自己進一步被伊斯蘭化，他們的官方宗教信仰比例也從祖靈和民間信仰轉換成天主教徒為主。1950年代，塔達那人樂於接受卡達山民族主義，自認為卡達山人，因此大批改信天主教。雖然他們在後族群現象傾向於過去的塔達那人認同，但仍保留天主教為主的信仰。根據沙巴塔達那文化協會於2010年的調查，高達94%的塔達那人已經改信天主教^⑫。因通婚而改信天主教的比例逐漸增加，如今僅有不到500名塔達那人是祖靈或民間信仰者。相對於伊斯蘭教，天主教屬於邊緣。然而祖靈或民間信仰在塔達那社群裡，則是邊緣中的邊緣。

五、小結

本文從多層次的核心與邊緣角度，探討沙巴原民性的形塑。文中所探討的邊緣性層級有：前殖民時期（KDMR 群）、殖民時期（殖民地）、地緣政

^⑫ 採訪筆記：Monica Guanlin，2018年8月8日，九魯民眾會堂。

治（蘇祿海區域）、聯邦層級（沙巴）、州層級（東海岸）、沙巴當地人（KDMR群）和 KDMR 群（非兵南邦方言群）。沙巴原民性和邊緣性的連結較強，而可分成文化認同及宗教兩個元素。

如上所說，原民性的概念是隨機、互動且歷史的，是不斷根據時代的需求而修正的。KDMR 群、當地人、原住民、卡達山、土著、泛土著等，這些名相都是不斷修正的產物。沙巴原民性的隨機性最能透過卡達山的概念理解，因卡達山婦女作為華裔的通婚對象、卡達山的居住位置和教會學校的地點都具有隨機性。這些隨機性相互作用讓卡達山方言群能夠發起民族主義。原民性的互動性則最能用以上多種層級的核心與邊緣關係理解。其歷史的面向則展現在前殖民、殖民和國族國家的敘述編排裡。

然而，沙巴原民性與非人道對待的關聯較少。在殖民和國族國家時期，當地人或許受到某程度的排擠，或不平等對待，但稱不上非人道。Tregonning 認為，特許公司擺脫過去其他特許公司（如：荷蘭東印度公司或英國東印度公司）虧待原住民的刻板印象。¹⁷³ 特許公司受到眾多有經驗與學術背景的殖民官員的協助，在原住民政務上，比其他英國殖民地來得出色。然而，殖民者仍從當地人手中奪取大量土地，同時殖民者也確保被當地人宣稱的土地受到保留。¹⁷⁴ 沙巴當地人一直是該州的多數群體，因此沙巴原民性與少數群體無關。反觀，沙巴的原民性和在地性有很大的關聯，且透過行為、生活方式與居住地的關聯等展現。

馬來西亞建國後，KDMR 群在大量伊斯蘭化政策的過程中失去選擇宗教的自由，非穆斯林當地人擔任高官的機率被認為比穆斯林少。這凸顯 KDMR 群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自稱為「第二等土著」（Second class Bumiputera）。但，KDMR 群無法代表整體沙巴當地人，其不平等待遇也不比西馬原住民嚴重。因此，沙巴當地人能向國際社會或國族國家要求更多道德主張的基礎較弱。沙巴漢認同也包括當地華人，此地方認同的加強更道出原民性本身不能只被理解為當地人和其他人（華人）之間的對立關係。較弱的道德訴求或許也是近年來沙巴原民性較不被強調的原因之一。

邊緣理論和非類屬性文化認同的關係雖被重視，¹⁷⁵ 但缺乏詳細的案例研

¹⁷³ Kennedy Gordon Tregonning, *Under Chartered Company Rule (North Borneo 1881-1946)*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58), 102.

¹⁷⁴ Amity Appell Doolittle, "Colliding Discourses: Western Land Laws and Native Customary Rights in North Borneo, 1881-191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4: 1 (2003): 121.

¹⁷⁵ Jocelyn Linnekin, Lin Poy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4.

究。地方主義的反動，也對邊緣地區的原民性有着顯著的影響。在沙巴的案例，核心與邊緣的關係已在前殖民時期影響原民性。這和太平洋島嶼的情況不同，這些島嶼因為地理位置偏遠，互動較少，僅在殖民時期互動增加，形成政經核心與邊緣的關係。^{①⑨}沙巴因接近海上絲綢之路，商業中心早在前殖民時期形成政經核心。因此，核心與邊緣對人群的劃分比原民性來得早，更具影響力。當地人理解社會世界和整理自身經驗的方式，也會影響人群劃分模式。在此案例即是「叢群」的概念，形塑着當地的原民性。

非類屬性文化認同模式的變遷，雖然有眾多因受世界性宗教影響的民族誌範例。過去非類屬性文化認同的討論多在太平洋、臺灣和馬達加斯加，缺乏伊斯蘭教作為核心宗教的案例。本文補充伊斯蘭教對文化認同的影響力，尤其是當代國際伊斯蘭主義崛起下，伊斯蘭教如何作為核心宗教影響邊緣的原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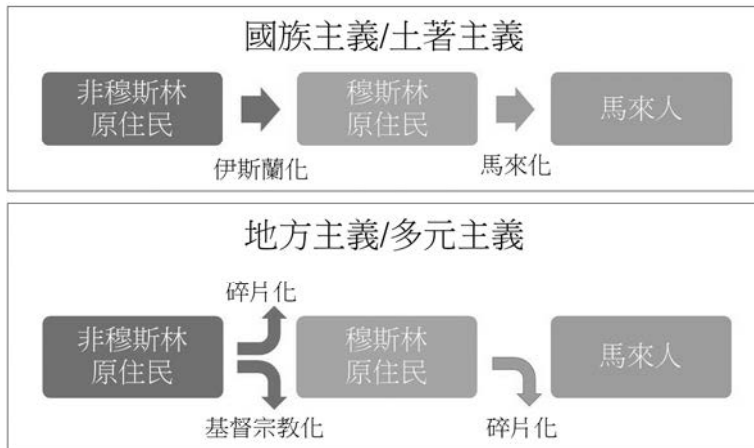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唐金英）

^{①⑨} Jocelyn Linnekin, Lin Poy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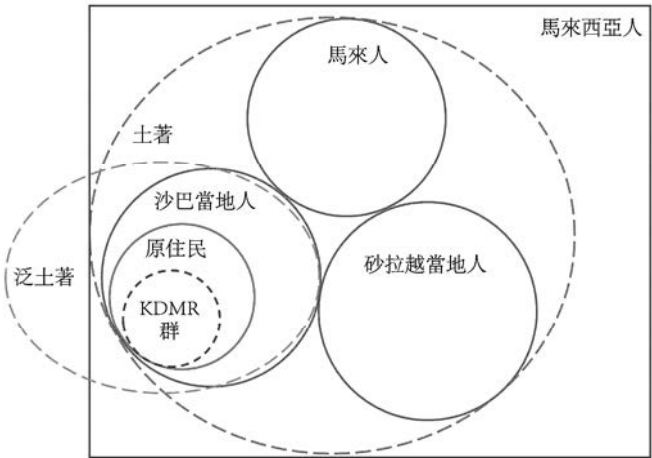
附圖1：附表1所提及的地區與城市



附圖2：當代沙巴脈絡下的國族主義和地方主義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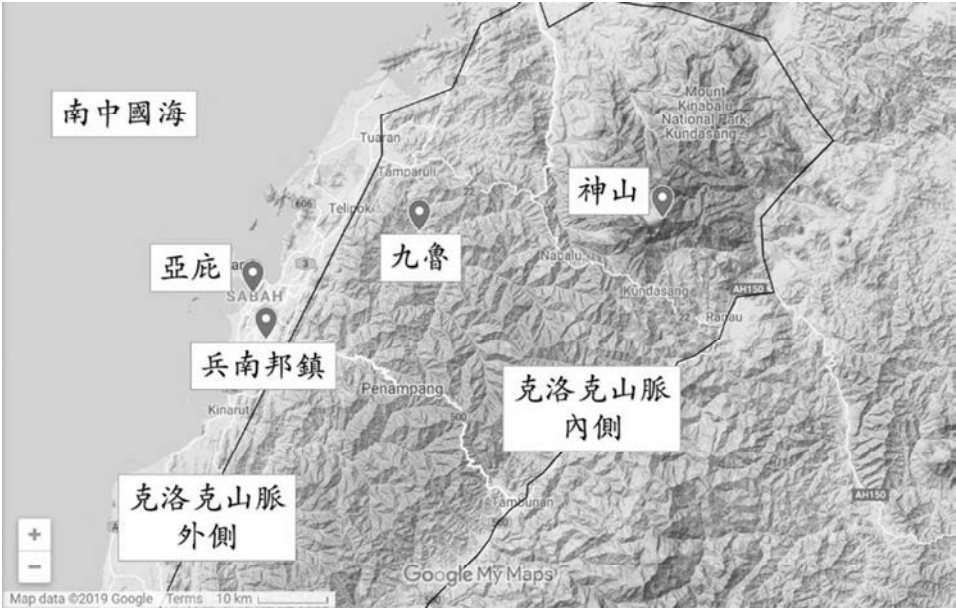


附圖5：第三節詮釋的各種原民性概念



圖片說明：實線表示具法律定義，虛線表示無法律定義。

附圖6：九魯、神山和兵南邦鎮（東貢岸鎮，Donggongan）的地理位置



附表1：沙巴近代史簡表

政權	時期	政體	首都現今所在地
汶萊蘇丹王朝（西）	15世紀至1881年	君主制	汶萊河（汶萊）
蘇祿蘇丹王朝（東）	1658至1881年	君主制	霍洛島（菲律賓）
英屬北婆羅洲	1881至1941年	英屬特許公司	山打根（沙巴）
日佔北婆羅洲	1941至1945年	軍事佔領	山打根→亞庇
英屬直轄北婆羅洲	1946至1963年	英屬皇家殖民地	亞庇（沙巴）
馬來西亞	1963年至今	君主立憲	吉隆坡（西馬）

附表2：馬來西亞常見的人群分類範疇與解釋

中文	英文	解釋
①土著	Bumiputera	不存在於憲法的詞彙，是①、②、④的統稱，時而包括③
②沙巴和砂拉越當地人	Sabah and Sarawak Native	南島語族，可以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官方認定近六十族
③西馬原住民	Aboriginal people	南島和南亞語族，十八族有各自的母語，非穆斯林
④馬來人	Malay	南島語族，母語為馬來語，穆斯林，實踐馬來習俗
⑤沙巴漢	Sabahan	出生在沙巴的馬來西亞人
⑥馬來西亞人	Malaysian	國族概念，非民族概念

附表3：KDMR 群、巴瑤人和汶萊人之間的自稱和互稱

他稱/自稱	稱：KDMR 群	稱：巴瑤人
KDMR 群	<i>Momogun</i>	<i>Sama</i>
巴瑤人	<i>Ida'an, a'a déa</i>	<i>Sama, a'a dilaut</i>
汶萊人	<i>Dusun</i>	<i>Bajau</i>

表格說明：汶萊人佔沙巴原住民人數的比例不如兩個比例最大的 KDMR 群和巴瑤人。為了聚焦，汶萊人的自稱或 KDMR 群和巴瑤人對汶萊人的他稱並沒有納入討論。

附表4：沙巴1911-1931年人口普查的粗略劃分

主要分類	細分
原住民 (Indigenous)	主要原住民：杜順人、姆律人、巴瑤人
	其他原住民：雙溪人、汶萊人、卡達央人、比薩雅人、蘇祿人、帝東人
中國人	客家人、廣東人、閩南人、潮州人、海南人、其他中國人
歐洲人	歐洲人、歐亞裔
其他	砂拉越當地人(Sarawak Native)、馬來人、印尼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菲律賓當地人、其他

資料來源：Lawrence Walter Jones, *North Borneo, Census of Population Taken on 10th August 1960, Additional tables*, 25-29, 134.

表格說明：表中「中國人」是1951年後才被視為華人。其中「其他中國人」包括來自黃河北部的移民，是東南亞二戰前少數被引進的華北移民後代。

附表5：沙巴不同執政時期的原民性政策和邊緣關係

年份	執政聯盟	文化認同政策	伊斯蘭化政策	與聯邦政府的關係
1963	泛卡姆統聯盟	多元民族	無	疏遠
1967	沙統	土著化	強烈	先近後遠
1976	沙巴人民黨	泛土著化	積極	親近
1985	沙巴團結黨	多元民族	無	疏遠
1994	國陣各成員黨	馬來化	非積極	親近
2004	國陣巫統獨大	土著化	非積極	親近
2018	泛民興黨聯盟	多元民族	被動	先近後遠

表格說明：2020年3月，國民聯盟(National Alliance)執政聯邦政府後，「泛民興黨聯盟」與聯邦政府的關係變得疏遠。9月閃電選舉後，泛民興黨聯盟被沙巴人民陣線(Gabungan Rakyat Sabah)取代。後者由國民聯盟、國陣和沙巴團結黨所組成。

附表6：砂拉越和沙巴當地人在聯邦憲法定義之比較

範疇	砂拉越	沙巴
定義	是公民；屬於以下的種族名單；是州的原住民，或這些種族的混血	是公民；是州內原住民的兒子或孫子；在沙巴出生，或出生的時候父親在沙巴定居
民族名單	比薩雅、杜順、卡達央、馬來、姆律等十五族	無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聯邦憲法161A 條文之六和七。

表格說明：表中「民族名單」僅列下和沙巴共有的種族，沒有列下的有：Bukitans、Sea Dayaks、Land Dayaks、Kalabit、Kayans、Kenyags（含 Sabups 和 Sipengs）、Kajangs（含 Sekapans、Kejamans、Lahanans、Punans、Tanjongs 和 Kanowits）、Lugats、Lisums、Melanos、Penans、Sians、Tagals、Tabuns 和 Ukits。

附表7：1961-1967年間沙巴兩種國族想像的合作團體

國族想像	主要政黨	聯邦合作政黨	文化協會
土著主義	沙統	巫統	沙巴杜順統一協會等
多元主義	卡統/卡姆統	人民行動黨	卡達山文化協會

表格說明：為了簡化，砂拉越的合作政黨與文化協會沒有放入表中。

附表8：1970-2010年沙巴民族人口比例

民族	1970	1980	1991	2000	2010
卡達山/杜順	29.9	泛土著 83.4	19.6	18.4	17.8
姆律	4.8		2.9	3.3	3.2
巴瑤	11.8		11.7	13.2	14.0
馬來	2.8		6.2	11.7	5.7
其他原住民	13.5		13.6	15.0	20.6
華人	21.4	16.3	11.5	10.1	9.1
其他（包括印度人）	6.6	0.3	34.5	4.8	1.7
印尼人	6.1		24.3 [*]	23.6 [▲]	27.8 [▲]
菲律賓人	3.1		8.2 [*]		
總人口（千）	653	956	1735	2603	3117

表格說明：1. 表格中帶*號的數字來自 Reid 的推測；帶▲號的數字統計時不包括公民。

2. 1970年民族是卡達山，而1990年至2010年則是卡達山杜順。

Core and Margin : Shaping the Indigenusness of Sabah, Malaysia

Bernard NG Jia Ha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of shaping the indigenusness of the Sabah state in Malaysia through pre-colonial, colonial, and nation-state periods. The concept of indigenusness originates from colonial knowledge but is based on the “unkinded” cultural identity since the pre-colonial era. The British colonists brought in the “kinded” cultural identity that emphasizes ancestry and lineage, which established the hybrid cultural identity of “unkinded” and “kinded”.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concept of “Sabah Nativ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ity. Therefore, the indigenusness of Sabah was unique and had excluded Sarawak Native and Malays of the Peninsula. After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the indigenusness was affected by two national agendas: Malayisation and Islamisation. Localism and pluralism thus emerged, and the recent “Sabahan” identity led to less emphasis on indigenusness. The localists weakened their indigenusness in response to the authority from the core area. In shor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re area and the margin is the main axis that shapes Sabah’s indigenusness throughout history.

Keywords: unkindness, Localism, Pluralism, Islamisation, Malaynisation

Bernard NG Jia Ha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aiwan University. 9 Elias Road, 519937, Singapore. E-mail: bernard.ng.jia.han@gmail.com.